

文化遺產與知識鬥爭^[*]

——戰爭期漢文現代文學雜誌《南國文藝》的創刊

柳書琴

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要

1937年7月台灣報刊廢止漢文欄，漢文文學雜誌紛紛停刊；然而，就在1941年12月1日，大東亞戰爭爆發前一週，台北市日新町意外發行了一份帶有重建純文學理想的漢文雜誌——《南國文藝》。何以一份漢文純文學雜誌得以在太平洋戰爭前夕，報刊雜誌禁用漢文、新聞用紙缺乏的時刻通過發行檢查？當時的文化知識界，有哪些利於漢文文藝雜誌重新出現的條件？此前發行的《風月報》其編撰人脈及成果之中，哪些成為了《南國文藝》的資產？本文企圖以《南國文藝》不尋常的發刊現象為出發點，思考皇民化運動下奄奄一息的漢文文化生產場域如何援用其他社會文化與知識資源，作為漢文文藝雜誌生產／發行的屏障？在此屏障下，殖民地學術研究系統、民間民俗研究工作者、漢文通俗文學雜誌社群、純文學創作者四者，如何交相聯結，開創出漢文禁令下漢文文藝的一片腹地？筆者認為，《風月報》、《南方》中，由於彰化旅北作家林荊南以及當時有「稻江歌人醫師」之譽的林怒濤對於歌謠採集整理工作的投入，延伸發展出《風月報》人士與當時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文學科東洋文學講座相關教授的合作關係，而後以林荊南及另一位彰邑作家吳慶堂薪傳戰前純文學雜誌精神的理念與行動為中心，《風月報》新文學作家為基本執筆群，終於促成了殖民地時期台灣最後一份純文藝漢文雜誌《南國文藝》的創刊。在皇民化運動主導當時語言、文化與知識

[*] 本文為國科會人文處專題研究計畫「東亞華文跨文化流動中的台灣漢文通俗文藝（1895-1945）」（NSC 96-2411-H-007-017-NY3）部分成果，謹此衷心感謝獎助單位，投稿期間陳師萬益、多位匿名評審，惠予詳細修改建議，以及研究助理蔡佩均協助文獻調查。

結構的當時，作為一個企圖和日語本位主義文化擴張進行抵抗，扭轉不均衡文化流向的批判性知識社群，以民間文學整理作為鏈接的契機，以學院資源取得合法關鍵，不計採取民族文學遺產化、知識化的柔軟姿態，開拓創作與言論空間，林荊南等人的努力具有不可漠視的文化價值與啟示性。

關鍵字：《南國文藝》 《風月報》 《南方》 林荊南 吳慶堂 林怒濤 稻田尹 台北帝國大學 漢文文藝 文化遺產 知識鬥爭



文化遺產與知識鬥爭

——戰爭期漢文現代文學雜誌《南國文藝》的創刊

前言

日據中晚期以後，由於大眾文藝意識的興起，純文學與通俗文學在題材與形式上相互滲透，逐漸無法斷然區分。1937年7月台灣報刊廢止漢文欄，此後大眾文化消費傾向的通俗雜誌《風月報》及其後身《南方》，^[1]取代台灣新文學運動肇始以來批判意識強烈的純文學雜誌，成為戰爭期漢文^[2]現代文藝雜誌僅有的破冰點^[3]；也因此，在漢文領域，通俗文學得到更快速的擴張。然而，就在1941年12月1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一週，台北市日新町意外發行了一份意圖重建純文學理想的漢文雜誌，雜誌中雖不乏受通俗文學形式及主題滲透的作品，但是更多隱含反戰思想或社會關懷的作品，已明顯不同於當時其它通俗刊物。

《南國文藝》，「南國文藝社」發行，月刊型態，發行一期後遭禁，成為絕響。短暫的發行使《南國文藝》在當今學界與台灣文學史上遭到遺忘，一般認為當時除了《風月報》、《南方》之外沒有其餘現代文藝性質的漢文雜誌，或認為軟性雜誌是戰時媒體箝制政策下漢文雜誌發刊的唯一形式。然而現存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的《南國文藝》，既不以通俗作標榜，也不單獨揭舉「維繫漢文」的聲稱，或特意突顯新文學建設相關理念。它以籠統的「整理台灣考古學上的文學文獻」為創刊宗旨，藉由變換文學場域中熟悉的發刊詞彙與宗旨符號，催生一個兼融傳統漢詩、民間文學、現代文藝、通俗文學、學術研究的現代文藝雜誌，並

[1] 《風月》（1935.5.9-1936.2.8）為傳統文人風雅休閒刊物，漢文欄廢止政策施行之前，即因花選活動引發花柳界爭議停刊。《風月報》（1937.7.20-1941.6.15）復刊之後，特意朝現代通俗雜誌銳力革新，並企圖參與殖民地平民公共領域流行文化與日常生活議題之建構。1941年7月，《風月報》更名為《南方》，國策色彩增加，但是依舊維持《風月報》通俗雜誌之基調。

[2] 本文使用的「漢文」一詞為日據時期用語，相對於「和文」而言，包含現代漢文與古典漢文。

[3] 戰爭期寥寥無幾的其他幾份漢文刊物均非現代文藝雜誌，譬如《詩報》為漢詩刊物、《崇聖道德報》、《孔教報》為儒教刊物。

且在多元混雜的文類中夾雜戰時罕見的批判性作品，閃耀著上溯事變前新文學雜誌批判精神的理想。

何以一份帶有純文學理想的現代漢文雜誌，得以在漢文欄廢止、新聞用紙缺乏的時刻通過發行檢查，當時的文學界、學術界、政治社會領域，有哪些利於漢文文藝雜誌再次破冰的人際網絡與知識資源呢？《南國文藝》籠統的發刊辭與混雜的內容隱藏了獨特的發行策略，展現的是台灣遭遇極端強勢的皇民化文化輸入之際，漢文文藝工作者不以本質主義的漢文維繫概念，或其他疏離、傾軋關係，而以結盟、滲透、脈絡挪用方式進行回應的珍貴案例。筆者發現，《風月報》、《南方》中，由於彰化旅北作家林荊南以及當時有「稻江歌人醫師」之譽的林怒濤，對於歌謠整理工作的投契，延伸發展出《風月報》人士與當時台北帝大稻田尹等教授的合作關係，使得原不相屬的漢文文藝界與帝大東洋文學教授之間，開啟了民間群體與大學機構的接觸與交流。而後，以不滿足於《風月報》通俗路線的林荊南以及另一位彰邑新文學作家吳慶堂，兩人薪傳事變前新文學雜誌精神的理想與行動為主導，部份《風月報》新文學作家及漢詩人被邀請為基本執筆群，終於催發了太平洋戰爭前夕台灣最後一份漢文現代文藝雜誌《南國文藝》之創刊。

《南國文藝》以延續純文學批判精神為主要理想，卻以整理民間文獻及文化遺產為標榜，透過對在地文藝體「漢文文藝」的彈性定義，整合戰爭期零星的漢文文藝生產資本。在林荊南、吳慶堂等人的努力下，《南國文藝》成為事變前新文學作家；《風月報》、《南方》民間歌謠研究者、漢詩人、現代通俗文藝創作者；以及帝大東洋文學教授，三種不同脈絡交會的結點。藉由起動複數脈絡蘊含的多重資源，《南國文藝》獲得發刊的政治合理性，在短暫發行中實踐釋放被禁錮的民族語文與播撒在地文化聲音之操作。本文將從兩個層面針對上述發現進行探討：第一，簡介戰爭期的異數——漢文純文藝雜誌《南國文藝》之內容、特色、撰稿群背景，它與《風月報》社群的關係，及其上溯事變前台灣新文學漢文寫作的意圖。第二，以《風月報》民謠整理工作為中心，追蹤《風月報》新文學作家、漢詩人、民間文學研究者與殖民學術人員的合作淵源；同時探討《南國文藝》創建者如何援引

台北帝大文政學部台灣研究風氣及教授學者的「加持」，以「民間遺產知識化」的柔軟姿態進行文藝出版鬥爭。

一、跨越事變、整合漢文現代文藝資源：《南國文藝》創刊

《南國文藝》由林荊南、吳慶堂兩位編輯，及一批與《風月報》、《南方》有深厚淵源的漢文寫作者共同締造。在皇民化運動如火如荼、東亞戰爭不斷惡化的時期，投入《南國文藝》的這一群人是殖民地時期台灣最後一批對公開創作／發表依舊抱持信心和熱情的漢文現代文藝寫作者，也是日據時期漢文現代文藝創作領域中最後一批撤離的人。在漢文教養快速流失的殖民統治後期，儘管他們的書寫創作能力有限，但是這次集結卻是漢文現代文藝寫作者在事變之後唯一一次以「重建純文學批判精神」為理想進行的集結。這群人分屬什麼脈絡？在《南國文藝》上進行了哪些創作？集結的主要動機是什麼？本節首先就此加以介紹。

（一）《南國文藝》靈魂人物：跨越事變的作家林荊南與吳慶堂

《南國文藝》創刊號，16開本，56頁。內容收錄創刊文字及賀文（含漢詩）7篇，日、俄小說譯作3篇，短篇小說及小品創作8篇、中國新文學作家巴金小說1篇，現代詩10首，隨筆1篇，學術論文1篇，詩論1篇，當代漢詩輯錄1則（共5首），明清台灣古典詩選輯錄1則（共24首），文獻史記1篇，作家短訊1篇，讀者回函1篇，編輯文字、徵文啟示、投稿簡章、訂購說明等共4篇，總計68篇大小作品及啟示。包含多種文類，但以現代文藝為主流，純文學



《南國文藝》創刊號封面

作品較通俗文學占有重要地位。知名畫家林玉山繪製封面，題名〈曉發〉，以單色清淡水彩描繪檳榔樹影搖曳中，農夫牽牛過水田的田園晨間遠景，洋溢平和素樸的台灣鄉村情調。

林荊南（1915-2002），彰化竹塘人。根據施懿琳教授調查研究，林出生貧困農家，幼年跟隨鄰居謝清先生學習古文，1929年14歲入私塾，讀四書、詩學。1935年參加《台灣新民報》徵文獲得佳作，次年開始在《台灣新民報》、《台灣新文學》、《新高新報》發表白話散文、現代詩。^[4]1937年中日事變爆發時，擔任《台灣新聞》社員林支局記者，首次撰稿便因揭露日人經營的三五株式會社源成製糖廠欺壓農民之事，替一兩百位農民紓困，轟動一時，因此曾險遭日警收押。1938年考取「東京高等實務學校滿蒙科」，前往日本1年，夜間赴「研數學館」修習高等北京語。1938年4月返台，在台北市役所替第一助役大田教授襄理文墨，未及半年離職，於市營魚市場擔任臨時記帳員約半年。期間受滿蒙科日籍同學及台灣友人赴華發展影響，原有意前往大陸，因妻、母反對作罷。後與友人合資開採煤礦，費時3年，血本無歸。1941年，林荊南以筆名「嵐映」，加入《南方》上由「漢詩人七大毛病論戰」引爆的第3次新舊文學論戰，代表新派極力批判鄭坤五等舊派。^[5]1941年12月，召集文友創刊《南國文藝》。

戰後林荊南生活屢經波折，但寫作不輟，以漢詩為主；^[6]然

[4] 1936年1月發表散文〈零碎〉於《台灣新民報》，4月發表現代詩〈詩雨〉於《台灣新文學》1卷3號，發表〈愛美的觀念〉於《新高新報》，卷數不詳。另有，〈祭吳沛霖先生〉等發表地及時間不詳的若干作品。參考，施懿琳〈林荊南生平及寫作年表〉，收錄於《林荊南作品集》雜文·詩歌卷（彰化市：彰化縣立文化局，1998年），頁896-918。

[5] 當時有人以「嵐派」與「坤派」的論戰，稱呼這一場論爭，可見林荊南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參見，陳春美〈決戰《南方》——戰爭體制下的新舊文學論爭〉，台北師範學院台灣文學所碩士論文，2005年1月，頁96-106。

[6] 林荊南戰後曾擔任《民報》副刊編輯、《民聲報》主筆、《和平日報》北分社創立工作等。二二八事件中，繫獄59天。1949年參與《台灣詩學月刊》，整理前輩遺稿、搜羅今人佳作，林獻堂擔任顧問、鹿港秀才施梅樵擔任會長，會員二十餘人。同年，赴花蓮擔任《東台日報》編輯，任職期間撰寫〈漁家女〉、〈新桃花過渡〉、〈鄭成功〉、〈黛玉葬花〉等劇本。1950年因「意志不堅，思想左傾」之罪名被逮捕，送往綠島進行思想改造1年多。1952年獲釋，到台中《民權導報》當秘書及新聞編輯工作，未及滿月，報社宣布關閉，再度失業。1953年擔任《詩文之友》主編。1955年起，任職於彰化縣農會9年。1963年起，經營菇菌研究所、曲木工廠、塑膠工廠、毛衣加工廠、食品加工廠等。1998年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施懿琳教授編輯之《林荊南作品選集》，2002年過世。根據施懿琳教授調查，戰後林荊南除了參與《詩文之友》撰稿之外，六〇年代以後陸續著有《讀易山房詩稿》、

其戰前文學活動以新文學為主，萌芽於1935年左右。林氏漢文書寫能力奠立於青年時期之私塾教育，以及留日階段，文學觀則受戰前新文學精神薰染。21歲的青年作家，在新文學運動萎縮前的最後繁盛期懷抱文學之夢投身文壇。隨後兩大文藝陣地《台灣文藝》（1936年8月）、《台灣新文學》（1937年6月），先後因人力、財務、政治等因素陷入停頓，新文學運動迅速顯露頹勢，林氏初期創作也暫告一段落。

1939年9月賃居台北日新町之後，林荊南透過當時唯一漢文雜誌《風月報》，與北台及旅北新舊文學作家親近，也與日語作家有往來。林旅北期間生活拮据，因通曉中日文，曾受張文環之託將總督府情報部委託的全島新劇競技會日文劇本翻譯為台語，藉此紓困。《風月報》兼設漢詩欄，林與簡伯卿（《風月報》發行人簡荷生之子、創作白話小品）、吳漫沙（《風月報》新文學編輯、通俗小說作家）、林錫牙（《風月報》漢詩欄編輯）、^[7]以及後來赴華發展的《風月報》新文學作家陳世慶等人，每三、五日即觴詠一次。這一段翰墨因緣增強了他創辦雜誌的決心，對他影響頗大；《南國文藝》執筆者多為《風月報》、《南方》人士，^[8]與他此時累積的人際網絡也有直接關係。

《南國文藝》雖以現代文藝為主流，但是除了譯作之外，多數新進作家創作年資短淺，除了林荊南、吳慶堂、吳漫沙三人在事變前純文學綜合雜誌上有過發表經驗之外，其餘諸人的文藝活動多展開於1937年中日事變以後。《南國文藝》底頁印刷之編輯兼發行人雖為林為富（林荊南本名），然而帶有無政府主義思

《定軍集》、《望佛樓詩稿》、《芥子樓詩稿》等，另著有自傳小說〈窮與罪〉，以及《人參古今談》、《詩學講座·附錄詩學含英》、白話譯注《陸羽茶經》等。1973年起，提倡法古創新「巷中體」，並實際嘗試創作，達10年之久。參考，施懿琳〈林荊南生平及寫作年表〉，同上註，頁896-918。

[7] 林錫牙，字爾崇，1912年生。擅長舊文學，北台傳統詩人林述三之子，林述三1921年創立「天籟吟社」於稻江。1937年12月取代辭職的吳紉秋，擔任《風月報》漢詩欄編輯。1939年7月91、92期起，發表「芳草美人」等軟性文學。戰後連任「中華民國傳統詩學會」第二、三任理事長及「天籟吟社」社長，著有《讀父書樓詩集》。參見，楊永彬〈從「風月」到「南方」——論析一份戰爭期的漢文文藝雜誌〉，河原功監修《風月·風月報·南方·南方詩集總目錄·專論·著者索引》（台北：南天書局，2001年6月），頁87。蔡佩均〈想像大眾讀者：《風月報》、《南方》中的白話小說與大眾文化建構〉，靜宜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6年7月，頁152。

[8] 譬如，吳慶堂、吳漫沙、林錫牙、王養源、吳醉蓮、鐵骨生、楊鏡秋、莊文夫、李學樵、東方散人、晉奇、蔚然、蔣培中等人。

想的吳慶堂，除了協助編輯之外，對刊物走向也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吳慶堂（1911-1995），彰化市人，七歲左右入彰化吳秀才私塾習漢文，讀《三字經》、《四書》等古文教本。1926年公學畢業後，常到賴和醫院閱報室閱讀新文學雜誌，並經常以公學校鉛筆和作業紙，在醫院門前為病童和乞丐們繪製素描。賴和驚見其美術天份，曾勸吳父表明願資助吳赴日留學，就讀藝術學校，惜未成功。^[9]同鄉因緣使吳慶堂受到賴和啟蒙而開始事新文學創作，結下文學師生情誼。同一時期，吳開始和「台灣文化協會」彰化左傾抗日志士來往，受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在「黑色青年聯盟」及「勞動互助社」檢舉事件中，兩度遭受牢獄之災。^[10]出獄後，於1934至1937年間，赴廈門中華醫學校就讀。

在《南國文藝》諸人之中，比林荊南年長4歲的吳慶堂無論在創作資歷、社會運動參與、中國經驗各方面，均顯突出。自1929年後，他以漢文創作現代詩、散文、小說，同時亦創作舊體詩。根據呂興忠的研究，吳慶堂擅長刻劃殖民地經濟剝削下農村的破產，以及失業農民如何湧入三〇年代新興工業都會，在帝國資本肆虐下成為都市勞工階級的過程。^[11]代表作〈冬寒〉、〈秋兒〉，皆帶有明顯的左翼色彩與反殖民批判精神，及至戰爭期發表於《風月報》的詩作〈血的顏料——鼻子手術時偶作〉，^[12]也以「無數灼灼的龍虎在爭鬥／宇宙已燎成了煙火的地獄」，「那是『世界的風災』」等譬喻和象徵，對軍國主義進行揭露和批判，成為通俗雜誌中罕見的異數。

相較於吳慶堂，林荊南、吳漫沙（1912-2005）步入文壇的時間較晚，兩人在1935年開始接觸文藝活動，1936年在報刊雜誌

[9] 吳慶堂口述，參見呂興忠〈舉起台灣新文學反殖民的黑旗——吳慶堂未刊手稿初探〉，呂興忠編《繪聲的世界——吳慶堂作品集》（彰化：彰化縣立文化局，1997年），頁213。

[10] 吳慶堂於1927年無政府主義「黑色青年聯盟」事件，被牽連入獄。1929年因同鄉無政府主義人士吳本立校長的協助，轉赴吳主持之中國大陸福建同安縣華文小學任教。1930年返台，次年又因「勞動互助社」事件及先前與吳本立接觸等嫌疑，再次入獄。

[11] 參見呂興忠〈舉起台灣新文學反殖民的黑旗——吳慶堂未刊手稿初探〉、〈年表〉，《繪聲的世界——吳慶堂作品集》前揭書，頁250-275、226-230。

[12] 繪聲，〈血的顏料——鼻子手術時偶作〉，《風月報》122期，1941年1月19日，頁17。

上發表作品，《風月報》創刊後日益活躍。林荊南的創作起步，直接受到吳慶堂的影響。晚年林荊南回憶個人文學生涯時提到約莫十八、九歲時，由吳慶堂引導到彰化市仔尾拜訪賴和先生的情景。他特別記下當時的對話與體會：

「賴先生，我想走文學這條路，請先生教我、指導我，要如何走出去？」

「這條路不好走，不好走，要有勇氣……」

不好走，就是要命的坎坷路；要有勇氣，就是要有與時代賽車的勇氣，賽車有時會要命的。^[13]

參照吳慶堂年表推測，此事應在1934年吳赴大陸之前。診間談話雖短，卻對林荊南產生了重要影響，此後他成為賴和的終生私淑者。晚年他推許賴和先生的古典詩中含藏革命精神，「以賴和先生為風範的新的礪溪文學」具有與「礪溪古典詩文」不同的劃時代開創性。他並表示，他為古典詩效力四十餘年，正是受到賴和先生的影響。^[14]

林荊南、吳漫沙為戰時文壇少數活躍的漢文現代文藝作家，吳慶堂作品量不及兩位，但持續保持漢文創作，在漢文作家紛紛停筆或赴大陸而停止創作的時期，這幾位「跨越事變」的作家成為漢文現代文藝圈的主力。吳慶堂引導林荊南創作新文學，林荊南亦曾代理吳漫沙編輯《風月報》；林發行《南國文藝》時，吳慶堂任編輯，吳漫沙也參與撰稿。三人為好友，然而吳慶堂、林荊南曾受到賴和先生影響，吳慶堂亦曾接觸左翼文化運動，這些經驗使他們在創作與編輯路線上多了一份繼承台灣新文學傳統的理想，而與三〇年代從福建移住、受徐坤泉鼓勵培育，以創作言情文藝為主的吳漫沙有明顯不同。^[15]

[13] 林荊南〈礪溪文學與我一代序〉，施懿琳《林荊南作品集》小說集（卷一），無標示頁碼。

[14] 同上註。

[15] 吳漫沙，福建晉江人，在中國大陸完成教育，後因父來台經商，於1929-1931年短暫居台，1936年陪母親正式定居台灣。同年發表三首現代詩於《台灣新文學》。其晚年回憶提到，1935年左右因為參與楊逵《台灣新文學》雜誌假太平町「高砂西餐廳」舉行的新文學座談會，並受到葉陶女士的拜訪及其「台灣青年應該認識時代的道理」一席話鼓勵，開始認識文藝界朋友。後來嘗試寫兩篇短文，投稿《台灣新民報》副刊，接到主編徐

在《南國文藝》上，吳漫沙以其一貫的浪漫言情筆致，以家境富裕的高女學生與大學生之清純戀愛為主題，發表短篇小說〈梅〉。吳慶堂則以「繪聲」、「孤丁」等筆名，發表了現代詩〈情書——寄給一個女性〉及詩論〈詩是什麼？〉。〈情書〉是一則住院病患寫給護士的情詩；〈詩是什麼？〉表述他追求靈魂的反思、生命真善美、人與自然融合的詩觀。以吳慶堂的思想傾向、文學資歷及犀利文風，《南國文藝》上發表的這兩篇作品，在質與量上均顯平實，並無特殊批判性或指導性。但是，雜誌上以「介紹中國著名創作」為名所刊載的巴金小說〈雨〉，所透露的不平常訊息顯示，個人創作上故作低調的表現或許是曾經兩度入獄的他，為維護新誌創刊順利所作的考量。

〈雨〉，1936年3月寫於上海，1936年4月15日發表於上海刊物《作家》第1卷第1號，後收入巴金短篇小說集《髮的故事》，今收錄於《巴金全集》。^[16]小說以杜斯妥也夫斯基知識份子小說式，憂鬱、敏感而神經質的第一人稱敘事，鋪寫嚴峻險惡的反革命鬥爭中，一位革命青年在遭遇女同志失蹤、被捕、遇害的過程裡，焦急地與其他同志倉惶走告、秘密設法，同時掙扎於不知如何將噩耗告知受難者母親，因而飽受驚恐、悲憤、傷痛及慚愧折磨的心理歷程。三〇年代國民政府為了清除共產黨及其他反政府者而實行白色恐怖，支持革命的巴金常在小說中觸及青年革命者孤軍奮鬥的形象和被迫害的殘酷處境，〈雨〉是其中佳構之一。小說中年輕革命者痛失同志，對於革命之道依然堅定不移的熱情，充分流露巴金風格。小說中隱晦的社會背景及大篇幅的心理描寫，則是為了躲避三〇年代國民政府的檢查。然而，此一效果竟也使這篇闇夜中悲悽的鐵血意志，不可思議地通過四〇年代台灣總督府報刊檢閱鐵網，出現在戰爭期台灣文壇上。巴金乃是無政府主義的信仰者，在他眾多傳世的出色小說中，〈雨〉並非知名作品；因此〈雨〉的成功登陸，反映了編輯者對巴金小說的高度熟悉及巧妙選擇，這不得不讓人聯想到吳慶堂在其中扮演

坤泉來信鼓勵，並提供專欄寫作機會，因而進入文藝界，此後創作以言情小說、現代詩及劇本為主。參見，吳漫沙，《追昔集》（台北：台北縣政府文化局，2000.12），頁47-53。

[16] 參見《巴金全集》1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1版2刷），頁14-34。本文中有關巴金之討論承蒙成功大學蘇敏逸教授賜教，謹此致謝。

的角色。

相對於吳慶堂，林荊南則在《南國文藝》上進行多方面的書寫，意圖刺激多文類漢文創作的風氣。他以「南」、「懶糸」、「余若林」、「嵐映」、「竹堂哲夫」、「哲夫」、「汀零」、「薇郎」等時人知悉或不知悉的筆名，乃至佯裝「同人」，發表〈血書〉（創刊辭）、〈東寧兵燹紀要〉（台史紀要）、〈愛蟲公主〉（翻譯）、〈海洋悲愁曲〉（翻譯）、〈海風〉（詩）、〈徬徨的小鳥〉（詩）、〈貓〉（詩）、〈我的生活斷片〉（隨筆）、〈鯤島詩選〉（明清漢詩選錄）、〈網溪觀菊呈嘯霞先生〉（漢詩）、〈編輯室日記〉等多篇作品及記事。

在《風月報》中，林荊南主要撰寫通俗言情小說，譬如〈大都會的珍風景——請惜卿妹來坐電車的信〉、〈哀戀追記〉、〈合葬〉等，或者戰爭詩〈遺兒部隊——跑上亡父的懷抱裡〉，另外也翻譯了當時知名的火野葦平戰爭小說〈血戰孫圯城〉（《麥與兵隊》的部份譯作）。然而，在《南國文藝》裡，林荊南從未創作或翻譯國策作品，也不刊登任何戰爭文學或戰爭詩。除了「偷渡」前述巴金革命小說〈雨〉之外，《南國文藝》還以介紹外國文學的方式，刊出黃淵清翻譯的托爾斯泰短篇小說〈愛與神〉。小說以基督信望愛精神為主題，講述窮鞋匠馬丁因為信仰基督，實踐博愛和寬恕而獲得救贖的故事。托爾斯泰小說譯文在台人筆下以中文譯出，在戰時是極其罕見而振奮人心的。日本文學方面，林荊南選譯的也是與時局議題毫無關係的，12世紀古典文學巔峰期短篇小說集《堤中納言物語》中的〈愛蟲公主〉，^[17]以及在台日人作家多田道子以台滬跨國戀情為主題的小說〈海洋悲愁曲〉。另外，林荊南還以文獻整理為名，在〈東寧兵燹紀要〉前言中，以「造逆（革命？），是給筆者不得細心去研究的」為理由，整理了「林爽文」事件相關文獻；並從《台灣縣志》中，將施肩吾、沈光文、齊體物、高拱乾……等歷朝詩人書寫台澎風土及歷史的知名漢詩，輯錄為〈鯤島詩選〉，刊於雜誌最末。不論在創作或編輯上，他採取的路線皆與在《風月報》中的表現有所不同。

[17] 一般多譯作〈蟲姬〉。

林荊南在題名〈網溪觀菊呈嘯霞先生〉的漢詩中，以「脫俗如翁偏愛菊。浮生愧我未栽梅。」、「晚節寒煙堪寄傲。東籬韻事漫相猜。」等詩句，借菊與梅譬喻他所尊敬的老詩人楊仲佐，結廬網尾寮溪，植菊養蘭，寄情詩文，保留名節，不附和時勢的志向。^[18]在〈海風〉中，則垂淚祈求不斷擴大的戰爭殺伐早日停止。^[19]此外，他以「同人」之匿名撰寫的〈徬徨的小鳥〉一詩，也顯露壓抑於內心的驚惶和反戰情緒：

〈徬徨的小鳥〉
世紀的殿堂掛着了支配生之權幕，
恍惚是一條神秘的獵網；
世紀的獵人現出猙獰不類的臉容，
吹着銷魂的口笛；
小鳥怕了
奮起歷盡風霜的羽膀，
飛上天之涯水之濱……
怎知道世紀的殿堂起了一大的爆音，
怎知道科學的餘燼，
延燒着神秘的宇宙！
誰也想不到躑躅的鐵蹄聲，
殘踏萬有的生機；
呀！呀！
小鳥的心靈突起了一陣陣的驚惶！^[20]

侵略者的鐵蹄、戰爭血腥的破壞，有如無法止息的狂風驟雨。瀾

[18] 參見〈網溪觀菊呈嘯霞先生〉，《南國文藝》創刊號，頁51。楊仲佐（1876-1968，別號嘯霞），畫家楊三郎之父，「網溪別墅」位於今永和中正橋附近河域，據說欲模仿王維之輞川別墅的意境。楊仲佐與其弟潤波（別號秋石）均為文雅之士，與北台達官貴人、文人墨客相交甚篤，聚會不絕。

[19] 〈海風〉全詩內容如下：「海上吹來了鹹辣的風，／殺嘩！殺嘩！掠過蒼翠的樹梢，／頃刻，這個樹林子，／一枝枝地枯了，／一葉葉地黃了，／整個樹林子盡是枯枝與落葉。／海風捲去了無數的落葉，／那蕭蕭的聲息雜著鹹辣的味兒，／發出一種淒婉而辛酸的哀音！／海風的威壓下了救活草木的雨露，／春的使者也沒能力可以培植草木抽芽；／地上的生靈呀！／祇好垂淚禱告鹹辣的海風快住；／冀望零落的樹林子，／能夠還元於往日的青蒼喲！」參見，《南國文藝》創刊號，頁19-20。

[20] 引自嵐映〈徬徨的小鳥〉，《南國文藝》創刊號，頁20；其中某些修辭顯現當時台灣白話中文的用字風格，譬如詩中「殘踏萬有的生機」一句。

漫在詩人眼耳之中的，是熊熊延燒的東亞大戰，隆隆的鐵蹄，和哀哀不已的塗炭生靈。林荊南「怎知道世紀的殿堂起了一大的爆音」，使人聯想到吳慶堂「那是『世界的風災』」，兩位編輯者在他們的詩作中，共同流露了對於「世紀的獵人」日本軍國主義的批判，以及對於無數受難者的哀愍。

綜上所述，透過暗渡陳倉的隱蔽批判策略，「跨越事變」的吳慶堂在《南國文藝》的編輯工作中，宣洩了他被壓制的事變前思想信仰；林荊南則在翻譯作品的規劃以及整理台灣文獻的訴求中，規避時局文章的翻譯，介紹了托爾斯泰鼓吹基督精神的作品，使戰爭期被打壓的基督教思想獲得出口，也讓殖民前台灣在地的歷史與文化重新發聲。上述作品以棉裡藏針的方式舉重若輕地處理，狀似平常，卻隱藏著編輯者膽大心細的寄寓。

（二）純文學批判理想與新舊雅俗兼容並蓄：《南國文藝》其他撰稿者及作品

《南國文藝》逾半數篇章以筆名發表，部份作者之真實身份已難察考。根據筆者調查，可掌握具體身份之執筆群主要隸屬於《風月報》、《南方》脈絡，由於相關研究鮮少對這些寫作者進行探討，他們的作品卻具有一定社會性，故在此分三層次稍加介紹。最後，再透過該社邀稿運作留下的線索，說明《南國文藝》為上溯事變前新文學理想所作的努力。

首先，介紹漢詩創作者。在《南國文藝》中漢詩、漢文所占篇幅不多，多為賀文或祝詩。在刊頭撰寫創刊祝文的吳醉蓮、王養源，為林荊南知交。吳醉蓮（1900年生）^[21]，南投人，林荊南居住稻江時與之往來密切，曾被寫入林氏小說〈哀戀追記〉中。在《風月報》上以詩話居多，曾任《南方》雜誌「南方詩壇」主編，偶有現代詩和散文等作品，其祝辭以「啟新舊之文學，鼓勵作家之精神」，肯定林荊南發行漢文雜誌在新舊文學雙面的貢獻。^[22]王養源，筆名哭丁。鹿港人，後移居屏東，作品主要刊於《風月報》，亦偶見於《南方》，以漢詩見長，為台東「寶桑吟

[21] 吳氏筆名眾多，有流石、流石山人、醉、仙、吳醉仙、錦、花顛、立禪、恨五、等閒齋主、閒齋、等閒齋、等閒齋、吳夢南、捲雲室主人等。

[22] 參見吳醉蓮〈祝南國文藝之誕生〉，《南國文藝》創刊號，頁1-2。

社」成員。^[23]他以生澀的白話文，引用郭沫若詩句，期許《南國文藝》的文學怒吼能覺醒民眾、驅使愛國熱情、護衛民族。^[24]李學樵（李天民），筆名詩瓢、學樵居士。台北人，擅畫蟹，《風月》編輯囑託及北台「鷺洲吟社」同仁，在《南國文藝》上與諸家詩人共同參與創刊感賦並撰寫祝詩。此外同樣在《南國文藝》上撰寫祝詩者，尚有年輕漢詩人及編輯蔣培中、林錫牙。以上諸人包含中部及北台詩人，與林荊南中部同鄉或旅居台北的地緣活動經驗有關，有的活躍於漢詩欄編輯，有的兼而關懷現代文藝，除了以寫作支持《南國文藝》的創刊之外，他們對台灣文學的整體發展也流露特別的寄望。王養源祝文中提起的郭沫若，不僅以中國左翼作家聞名，1930年代更從日本返國積極獻身抗日戰爭。非常時局下，如同前述提及的巴金作品，郭沫若詩作的引述，公開傳達的意旨有限，卻隱藏著耐人尋味的絃外之音。

其次，介紹現代文藝創作者。楊鏡秋，1941年《台灣藝術》「青年文壇」欄編輯，以現代文藝創作為主，有翻譯文學、短篇小說、現代詩等。作品多刊登於《南方》，在《南國文藝》中發表現代詩〈最近的心感〉、小說〈最小的〉，似為基督教徒，作品多取材於教義，〈最小的〉宣揚博愛互助、濟弱扶傾的精神。〈最近的心感〉，由「人們與我」、「真相」、「現在」、「北風」、「犧牲」五組短詩構成，闡述良知、寬容、忍耐、真誠、勤勞的真諦，並以隱喻方式針對戰爭中的白色恐怖、社會貧困化與無謂犧牲進行批判。

〈北風〉

北風吹來了，

他帶來一種淒聲：

「貧民，呻吟地睡在露天！」

伊懊悔了，懊悔！

[23] 楊永彬，〈從「風月」到「南方」——論析一份戰爭期的漢文文藝雜誌〉，頁91。

[24] 他以生硬的文句寫道：「這一聲怒吼，能向大地的民眾敲響警鐘，能向全世界文弱者，揮動我們鮮明的筆鋒，兼被愛國的熱情所驅使，永遠發射著不可泯滅的光芒，是權擁我們已為衛護民族的流血，為著國家的先驅者的。」參見，王養源〈祝南國文藝創刊〉，《南國文藝》創刊號，頁2-3。文中「權擁」等不流暢的用詞，均為原文之敘述。

當初貧窮的時候，不該把愛兒丟棄！哭咧！那一輪
月，不禁黯然失色；
似乎也灑一掬同情之淚。
飛到北方去的一群寒雁——為受不住南方底恐懼，也嘆息
了：
「茫茫神州，
何處有一塊安樂地？」

〈犧牲〉
灼灼的提燈，
在昏黑的夜裏，
勇奮地掙扎着；
絕大的光體，
在無垠的空中，
努力地旋轉着；
是倫理學上所畫定的本分麼？
不，這是犧牲。^[25]

當一次次侵略戰爭傳出捷報時，帝國、殖民地與淪陷區各地莫不發動盛大的提燈遊行，在詩人眼中這無異是猖狂的大日本帝國對其他國家與民族的灼傷。戰爭的凌厲與殘暴有如北風，隱藏在勝利背後的「真相」是龐大慘烈的「犧牲」，詩人盼望的是「天良」與「倫理」的回復，以及博愛互助、濟弱扶傾的新時代到來。

莊文夫，本名銘瑄，鹿港人，1916年生。筆名有文兒、文夫、暄也、莊幼岳、莊文兒等。莊太岳之子，莊遂性之姪，櫟社成員，戰後與林荊南相仿，專力舊文學。^[26]1939年以後常投稿現代文藝於《風月報》，也曾參與「漢詩人七大毛病論戰」，駁斥舊派。^[27]莊氏在《南國文藝》上發表詩組〈落葉集〉共5首，新

[25] 楊鏡秋，〈犧牲〉，《南國文藝》創刊號，頁21。詩末註記「十月二十一日深夜於二水」。詩句排列方式，依照原文。

[26] 戰後曾任行政院秘書、《中華詩學月刊》總編輯等。

[27] 楊永彬，〈從「風月」到「南方」——論析一份戰爭期的漢文文藝雜誌〉，頁90。

舊雅俗兼容。詠菊詩〈黃花〉中寫道：「鐮刀一樣銛利的北風，／不斷地吹打宰割，／憐你的命運多舛，／不然怎得年年耐冷守節。／幽豔而孤伶的菊花呀！」^[28]莊氏以菊花隱喻戰時下的節操，令人聯想到林荊南〈網溪觀菊呈嘯霞先生〉，而作為戰爭隱喻的「鐮刀一樣的北風」，也和林荊南的「鹹辣的海風」、楊鏡秋「帶來淒聲的北風」共同迴盪，指向不能明言批判的「亞洲的風災」。

陳蔚然，台北稻江人，生平不詳。筆名凌漫、蔚然等。在《風月報》勤於發表現代詩與小說，小品創作頗有特色，亦有討論文壇生態的文章。在《南國文藝》上發表短篇小說〈應酬〉，描寫掙扎於理想與現實間，追求文學之夢的文學青年「根思」，如何透過和社會底層的油條小販「阿龍伯」的生活接觸，逐漸省察自我追求的虛浮與僥倖。鐵骨生，員林開業醫生林糊，號鐵骨生，曾為文化協會活躍份子之一。在《南國文藝》上發表〈悶葫蘆〉一詩，「大廈將崩一木難持／欲挽狂瀾，狂瀾依然沒有底止。／枉費二十五年間賣藥市上，／所得着還是只有一個昔日的悶葫蘆！／可憐我當年的沖天之志／到而今，已經飄到那裡去呢？」。^[29]藉以抒發個人志向因為殖民地社會各種條件限制，行醫二十餘年仍無法獲得發揮的苦悶。

第三，介紹無法查知作者真實姓名的作品。這些作品中，有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社會小說或言情小品。晉奇〈灰色的人生〉以自敘口吻，描寫社會底層掘墓老人對自己貧困坎坷半生的回顧。劉浪鷗〈別〉，寫「景斌」一家因為社會蕭條，被迫離鄉背井到異鄉謀生的無奈與辛酸。主人公如此表達對於社會生活的失望：「呵！人生，由天真的童年，而入沈悶的時代，由沈悶的時代，轉入消極的老年，在這過程中，現時的我，豈不是跑上沈悶的時代嗎？」。稼農〈永遠的創傷〉，描寫鄉下青年教師「邦明」，兢兢業業成家，轉而經營小農場，最後卻不幸遭遇狂飆吹毀作物，妻子染病猝世，多年辛勞化為泡影。建信〈咒詛的辨當〉，環繞一個原本預計用來取悅情人的多餘便當，批判主人公

[28] 引自莊文夫〈落葉集〉，《南國文藝》創刊號，頁22。文中「銛利」一詞，原文如此。

[29] 引自鐵骨生〈悶葫蘆〉，《南國文藝》創刊號，頁18-19。

於火車旅途中瞥見的中產階級男性與摩登女子間，金錢取向的惡俗幽會。東方散人^[30]，作品以現代詩居多，散見《風月報》、《南方》，亦擅擊鉢吟；在《南國文藝》上撰寫小品〈和她相識以後〉，描寫不可自拔、不斷陷溺的婚外情。

《南國文藝》上這些社會小說或言情小品，現實主義與通俗文學手法相互滲透，事變前漢文純文藝小說至此已產生若干變異。但是以短小篇幅捕捉社會生活不同面向的這些小說，在題材上涉及都會與鄉村，敘述手法平實，故事多元，充滿日常性，貧困書寫及道德變遷為一大主題，沒有浮誇賣弄、類型化與程式化的缺點；在平易樸素的現實描寫中，透露了一般通俗小說中無法讀見的，對於整體社會經濟環境日益惡化的愁煩，以及時局悶壓及戰爭負擔帶來的恐懼和不安。詩人們以風災暗批東亞戰爭的腥風血雨，小說家則以戰時貧困揭示殖民社會的黯淡現實，莫不含蓄卻又明確地訴說著，另一種與強調「非政治路線」的《風月報》不同的文學話語。

《南國文藝》並未正面批評《風月報》編輯方針，但是〈南國文藝創刊感賦〉中以林荊南起首的聯吟，卻以「不隨風月」為主題，透露了他們視《風月報》為「病維摩」，欲以新刊力挽狂瀾、亂世降魔的期許。不論是帶有現實主義色彩的小品文、以漢文刊印的中俄現代文學名家作品，或者明清台灣詩選、台灣民變史錄，戰爭期雜誌上罕見作品類型的集中出現，實在不可等閒視之。事變前重要漢文作家周定山同年9月22日的覆函，更證明了《南國文藝》有意藉此陣地號召漢文前輩作家復出集結的意圖：

××足下！

由員林林糊君來信，才知道足下和幾個知友，組織一個文藝社。要發行文藝雜誌的壯舉，這是最好沒有的盛事？但，要我出為幫了忙，也曾提出幾個條件給我，然而，我自台灣新文學停刊以後，已經匿跡銷聲，絕對沒有執筆了！因為，烏煙瘴氣籠遍了社會，就不容你有勇氣好去插嘴的，於是乎，讓稚氣瀰漫去跳果吧！沒有法子。因這南

[30] 以雜誌上零碎資料推測，東方散人應為吳漫沙、哭丁好友，客居花蓮港。

方亦就得揭竿而起，這是台灣的文化代表了！可憐的很！我對林糊君所以不敢應承他。因為沒有像那麼閒情別致去描寫肉麻的作品，徒為麻醉讀者的工具為能事的！這實在是作家的良心問題。幸而台灣沒有作家？否則，那就不堪設想的笑話了！

（中略）每個月六〇頁的雜誌，倘若像『××』的有稿即登，不擇內容的，却也沒有甚麼問題呢，假如稍存良心的責任觀，原稿實在是頂難為的了。所以根本問題那解決，我才敢負起責任。因為這非我個人的關係，其他，像懶雲守愚虛谷少奇等的作家，倘我進出，他們於情誼上，當然要動員出馬的，那是沒有具體方針和精神內容，一味蒙昧接承，我是敢謝不敏的！（後略）^[31]

信中顯示，林糊曾居中協助爭取中部資深漢文作家的參與；然而，由於周定山對戰時社會的失望以及對事變後漢文文藝走向（特別暗指通俗雜誌）的鄙夷，已無公開發表意願，因此對於編輯方針不明的新刊邀稿不願支持。周氏的態度，也間接透露了事變前活躍的漢文作家（如賴和、楊守愚、陳虛谷、葉榮鐘等人）戰時不公開發表的原因。

《風月報》以培育新進作家為特點，但是側身《風月報》集團的林荊南對資深漢文作家卻不能忘懷。從擔任《風月報》代理編輯時期開始，便利用職務之便，多次呼籲先進作家共同出面挽救傾頹文風。他曾在卷頭語中提到：「舊友難逢，新友難得。想到台灣文藝界的消沈、不覺地給我洗了一掬的酸淚！那秋風一颭便添了我不勘的悲愁！呵！真是秋風落暮，藝園荒蕪……負有開拓這個廢墟也似的藝園的使者！跑到那兒去？一使者！拿起筆桿吧？重整藝園裡的旗鼓吧？」^[32]另外，也曾在編輯後記中呼籲：

台灣的作家群對漢文文藝界的認識未免太過於放鬆呀！這

[31] 參見周定山，〈一封信〉，《南國文藝》創刊號，1941.12.1，頁22-23。底線為筆者所加，文中修辭略有不同，原文照引。

[32] 引自荊南〈卷頭語：寄給台灣文藝界的有心人〉，《風月報》111期，1940年6月15日。底線為筆者所加。

個事情便是我所疑問的焦點啦！尤其是從來的漢文作家少有出為日漢文化交流効勞，就是對於本報的投稿者方面看來，也都是些新進的作家，新進的作家能夠出來互相勉勵便是我的疑問中的喜慰！我在這裡深深地希望新進的作家對於創作上更一層去努力，能夠創作有新生命的作品，同時盼望諸先輩捲土重來指導新進的作家，提高現代文學創作的水準。^[33]

對先輩作家復出的呼籲在《風月報》上並不多見，占有主導地位的編輯徐坤泉、吳漫沙對此皆未見關心。

吳慶堂、林荊南兩位「跨越事變」的漢文作家，受新文學作家及純文藝精神薰染，對於事變後的文藝走向不能滿足，因而意圖延續台灣新文學創作傳統。有鑑於新的政治社會現實，他們不再把理想的延續設定為事變前文藝路線或運動模式的回復。新刊避免採取顛覆或對立的分裂性作法，而以資源整合的概念，嘗試將通俗文藝中既有的多重人脈（漢詩創作者、現實主義小品作家、通俗文藝作家及其他），與具有雄厚文藝資源與批判視野的事變前漢文新文學作家加以聯繫。雖然，整合新舊作家初步獲得的成果有限，但是編輯者仍不放棄地以刊出回函、感謝賜教的方式，表現繼續爭取的決心。

綜而言之，《南國文藝》撰稿人員以《風月報》同人為主體，但創作內容及雜誌整體話語氛圍已明顯不同於《風月報》之通俗休閒路線。應當注意的是，漢文作家「跨越事變」的意願、經驗與能力，在此對刊物的發行與編輯走向發生了關鍵性的影響。不受限於在地文學概念或文類純種主義，以多文類鼓勵作家廣泛嘗試，也設法從時代中突圍，整合事變前後的漢文現代文藝資源，並介紹中國左翼文藝、俄國現實主義文學、在台日人作家小說創作。《南國文藝》以流動的台／中／俄／日多元現代文藝視野，取代對台灣新文學精神本質性的強調，對新舊雅俗採取兼容並蓄的連結，結果除了使純文學批判理想的繼承增加了現實的可能性，也為漢文文藝在戰時下的發展別開生面。

[33] 引自南〈編輯後記〉，《風月報》111期，1940.06.15。底線為筆者所加。

二、太平洋戰爭前漢文文藝雜誌的發行屏障：文藝遺產知識化

如上所述，《南國文藝》集團以「跨越事變」的作家為主導，以《風月報》寫作群為基本人脈。然而，這個多元整合戰時漢文資源的企劃，若沒有以《風月報》民間歌謠活動作為紐帶，連結戰時具有文化政治合理性的學院資源，則未必能促成「非常時」漢文文藝創刊的實踐。接下來，本段將以《風月報》「土俗學研究係」民謠及民間故事整理工作為中心，追蹤台灣民間文化人與帝大學者接觸交流的狀況，嘗試說明《南國文藝》如何在台灣文化日益矮化為「大東亞共榮圈」次文化的帝國現實政治框架中，將台灣漢文文藝定義為廣泛的本土社會民間文化遺產，以「民間遺產知識化」替代「維繫漢文」的慣有聲稱，發掘發刊策略。

（一）台灣考古學上的文學文獻：《風月報》土俗學研究係與稻田尹的合作

當林荊南等人企圖以雜誌模式重續純文學批判理想時，首先遭遇的敏感問題就是——如何向外說服1941年底的此時，漢文雜誌還有其創辦必要？有關這個問題的答覆，可以從稻田尹身上說起。

1943年4月台灣史上第一本日譯民間歌謠集《台灣歌謠集》問世，是在台日本文化人稻田尹總結其兩年多台灣歌謠調查、整理、翻譯工作的一項重要成果。稻田尹（生卒年不詳），日本茨城縣人，1941至42年間擔任東洋文學研究室助手^[34]，熱衷於台灣歌謠及歌仔冊調查，1940年起在《南方民族》、《台大文學》、《民俗台灣》、《台灣時報》、《台灣》、《台灣文學》等雜誌，頻繁發表有關台灣歌謠之調查與研究文章，1943年4月相關成果由台灣藝術社集結出版。平裝本，32開，一百多頁的《台灣歌謠集》至今雖出版超過一甲子，猶被台灣歌謠及台語研究者廣泛參考。^[35]

[34] 參見《台北帝國大學一覽》（台北：小塚本店印刷工場），〈職員（文政學部）〉1941、1942年份。

[35] 此外稻田尹同年還出版《台灣むかし話》（台北：台灣藝術社，1943年）一書。

然而這項成果並非稻田一人的成就，林怒濤與林荊南都是舉足輕重的幕後功臣，而《風月報》中其他關心歌謠的人士也參與了整理討論工作。《風月報》創刊時，歌謠原未受注意，1941年1月第122期開始出現相關報導及內容，爾後此議題逐漸活絡，直到更名《南方》雜誌月餘的1941年8月，歌謠整理已為該誌特色之一。

《風月報》歌謠、故事的整理活動，以「土俗學研究係」為中心。第122、123期刊出該係設置消息，成員有稻田尹、林怒濤、王連喜、陳達儒、林荊南、吳漫沙等人。^[36]研究係的成立直接受到稻田尹影響，是1940年底稻田赴台灣歌謠家林怒濤宅，與林怒濤、林荊南、陳達儒（帝蓄唱片會社文藝部）等人聚會，共同商議後的結果。林荊南在〈冀望文藝同志的協力〉一文中，如此記載：

筆者於客年年暮，在本島的歌謠大家怒濤君的家裡，會見了帝國大學東洋文化研究室的稻田君和帝蓄唱片會社文藝部的陳達儒君；四個人圍在一張四角型的桌子，總沒有隔腹的檢討了台灣的文化；如皇民化運動，演劇界的過去現在將來，新舊歌謠的本質，舊藝術的調查與發掘等等。檢討的時間約有四個鐘頭之久！……當時稻田君希望本島的藝術同志若有可以資於土俗學研究的材料，請莫惜精神與物質的犧牲，大大的寄稿。（收稿處風月報社土俗學研究係）^[37]

林怒濤（1883-1960），台南市人，本名林清月，筆名有不老、怒濤、訴心難等。生父鍾國棟為前清官吏、養父林汝聘為秀才，晚年設私塾教學，自幼跟隨養父學習四書五經，漢文基礎深厚。1910年在台北大稻埕開設宏濟醫院，為台灣早期私立西醫院之

[36] 參見一記者〈文藝消息〉，《風月報》123期，1941年2月1日，頁20。

[37] 引自荊南（林荊南）〈冀望文藝同志的協力〉，《風月報》122期，1941年1月19日，頁12。

一，1933年創設私立綜合醫院。^[38]林氏行醫之餘雅好歌唱及創作歌謠，多年在北投、萬華、北部茶山、中南部娼館與旅行社等地進行採集，看診時常與患者忘情討論，甚至在診所門口貼出零售自製歌集的廣告單。由於他「凡歌必記，有聞必錄，時時歌唱以自娛」，採錄歌謠及流行歌甚多，並致力於推廣，因而博得「稻江歌人醫師」^[39]的美稱。

《風月報》發行人簡荷生與林荊南交往密切，受到「土俗學研究係」同人歌謠整理活動的影響，開始對此重視，並藉業務拜訪通告中南部文友。雜誌發行人的提倡，使原本獨自從事歌謠整理的林怒濤表示：過去書寫歌謠拾遺時，有人以時人不好歌謠，不如停筆為佳相勸，但是簡荷生從中南部歸來後告之「好讀者多亦有之」，他在選稿時也發現「在歌謠衰頹之今日，不料近來漸見有人投稿，盡是佳作」，因此轉而期待「至今以後。吾願普天下錦繡才子。同聲相應。究古推新。以阻此途之廢墜也。」^[40]在第122期中，他輯錄〈蓬萊春唱〉2首，拋磚引玉，提倡歌謠整理風氣；次期（123期）便獲得王連喜、蘇友章等人的歌謠投稿，「二氏皆工詩文。又雅好歌謠。玉稿寄到風月報。余拜讀其歌詞。趣味津津。洵難得之佳作也。」^[41]獲得「同志」，「風雅得以維持」，使林怒濤的更為投入，此後一直到1941年8月（136期），幾乎每期都可看見他以「蓬萊春唱」、「歌謠拾遺」、「蓬萊消夏小唱」等小欄，所輯錄的台灣歌謠。除了林怒濤的欄位之外，也固定刊出張淑子「台灣風俗」、「台灣故事」等小欄。《風月報》編輯特別將歌謠稿件集中編排，並以「民俗學」之眉題，整體突出歌謠及民間故事的欄位。在眾人努力下，民間文學整理在1941一年間，成了《風月報》版面中一個突然熱絡起

[38] 林怒濤1897年入日語傳習所，結業後受雇於總督府台南醫院當翻譯，1901年進入設立未幾的「台灣總督府醫學校」，1906年為第四屆畢業生。後在赤十字社台灣支部病院、台灣病院（今台灣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服務，由於研究鴉片戒治著有成績，被任命為總督府地方病調查委員會囑託，1923年出版《地球上阿片之運命》。戰後任台北市醫師公會第一任理事長（1945），為地方名士。曾出任台灣歌謠協會理事，出版《仿詞體之流行歌》、《歌謠集粹》等書。參見，王美雪撰，許雪姬總策劃《台灣歷史辭典》（台北：行政院文建會，2004.05），頁484。

[39] 參見莊永明〈稻江歌人醫師—林清月〉，張炎憲、李筱峰、莊永明編《台灣近代名人誌》2冊（台北：自立晚報，1987年），頁76-84。

[40] 怒濤（林清月）〈歌謠拾遺〉，《風月報》122期，1941.01.19，頁14。

[41] 怒濤〈歌謠拾遺〉，《風月報》123期，1941.02.01，頁5。

來的議題。

除了以林怒濤為主的採集之外，林荊南進一步翻譯事變前劉捷〈遺產〉^[42]一文，作為民間文學整理的方法論。他在譯文前特別以「保存先代的意志，感情思想」及「整理文化財」的概念，陳述民間文學整理工作的意義及重要性：

過去我們的先代的生產舞台和生活樣式及其意志，感情，思想等是比較田園或是財產更可貴重的。生為後代的我們，既然不能相續先代的田園和財寶，既然不能保守我們先代所遺下的物質，難道還得把先代的意志，感情思想棄之不顧嗎？大家要重新認識，「發掘民間文學是後代人應幹的重大使命，尤其是文化人不得不效勞的大業！」所以我們於今年春初設立了「台灣土俗學研究係」，以資全島民奮起收拾先代所遺下的文化財。

我冀望讀者們別要誤會。我不是在叫全島民還返於過去的生活樣式；目的！是要知道俗們的先代也有遺下那麼一大筆的文財化（按，文化財）的，我又不是在讚美先代所遺下的文化財的，目的！是要知道台灣過去的文化生活史，有裨益俗們的，也不妨把她模倣，所謂「取長補短」的方法，是過度的環境裡所必研究的條件。^[43]

如上所引，林荊南以保存「文化財」、認識「台灣文化生活史」等理由，表達了「土俗學研究係」在激烈的文化變動期中成立的動機及理想。^[44]

1941年7月，《風月報》刊出「土俗學研究係」改名「台灣民俗研究會」的消息，同人為稻田尹、怒濤、張淑子、余若林、林對等人，與前期略有些微出入。此外，消息中提到《風月報》

[42] 林荊南選譯劉捷〈民間文學的整理及びその方法論〉其中一節，另定題名為〈遺產〉。劉捷一文原載《台灣文藝》2卷7號，1935.07，頁116-123。

[43] 引自哲也（林荊南）譯，劉捷（作）〈遺產〉，《風月報》133期，1941.07.01，頁33-34。底線為筆者所加。

[44] 不過為了迎合時勢要求，確保研究係存在的合理性，林荊南也曾以「台灣民俗研究會」名義，創作〈志願兵制度實施奉讚歌〉。歌詞略舉二段如下：「一、山高水秀阮南瀛。久抱忠君的熱情。真歡喜。真光榮。明年阮是日本兵。二、地靈人傑阮南瀛。男子立志卜當兵。敢冒險。敢犧牲。建設東亞阮做前。」參見，《風月報》133期，1941.07.01，頁36。

「民俗學欄」原稿，皆為「台灣民俗研究會」同人所編，而且研究會正著手把欄內作品譯成日文，未來將漸次發表到內地雜誌上，「冀望大家對於這點的小工作竭力支援。」^[45]實際上林荊南的歌謠翻譯工作，早在研究係及研究會成立前的1941年初即已展開^[46]，此後持續未斷，最後才促成了前述日文版《台灣歌謠集》的出版。

《台灣歌謠集》出版時，書前輯錄三篇序文。林怒濤序文寫道：「稻田先生熱心研究島民歌謠。以國文國語譯述。而詳解之。先生所集者。關於民情風俗之歌謠尤多。特有一讀之價值。」；「研究愈深。愈能發見箇中真理。悟其奧妙。或藉以遣興。或可以陶冶性情。俾益人生之修養。豈淺鮮哉。」^[47]其後的稻田〈自序〉，則於闢頭兩段以無任銘感之語氣，大力感謝林清月、林荊南、林對等人兩年間對此工作不遺餘力的協助。^[48]

《南國文藝》創刊後，有關雜誌走向的說明方面，以林荊南〈血書〉最具代表性。〈血書〉旨在辯明漢文雜誌發行的必要性，形同創刊辭。林荊南以志願兵制度下風行一時的「血書」一語作標題，開宗明義卻點出兩者根本差異，強調對於文化工作「不計血本」的使命感。該文從「台灣還有創刊漢文雜誌的必要嗎？」，申明《南國文藝》創辦宗旨，表示漢文雜誌創辦與否並非「有無必要性」的問題，而是文化人應如何思考戰時「文化工作的使命及義務」的問題：

我不是要獎勵人們來讀漢文；也並不要給讀漢文的人們來讀；我也沒有甚麼叫做有目的底行動，我只知道我自己所做得到的事情我應該加了馬力去做；做出來是有益還是無益，我也是談不到的；東亞新秩序的建設，文化人對於文化方面的工作的使命，我在想，文化人都有這個文化工作的義務。

況且，台灣未整理的文獻（考古學上的文學）還是很多，

[45] 參見《風月報》133期，1941年7月1，頁36。

[46] 參見一記者〈文藝消息〉，《風月報》123期，1941年2月1日，頁20。

[47] 參見林清月〈序〉，稻田尹《台灣歌謠集》（台北：台灣藝術社，1943年4月），卷前，頁碼無標示。台灣大學圖書館館藏。

[48] 稻田尹〈自序〉，《台灣歌謠集》前揭書，頁1-2。

這要叫什麼人來整理？這個可不是我們文化人應該去關心的事實？^[49]

值得注意的是，林荊南以「整理台灣考古學上的文學」作為創刊理由，而未標舉日據時期其餘漢文詩刊、報刊常揭櫫的「維繫斯文」主張；而且文中雖提及「東亞新秩序建設」，但誌面中與相關議題有關的文章或討論卻趨近於零。

除了〈血書〉之外，署名「無涯」者所作的〈祝南國文藝發行〉，亦強力肯定漢文雜誌發行，言論份量與〈血書〉不遑多讓。他檢討《南方》、《台灣文學》、《文藝台灣》、《台灣藝術》、《台灣》、《民俗台灣》等當時主要文藝雜誌的性質與走向，藉此說明為何在這些雜誌之外，特別是在《南方》、《台灣藝術》卷末漢文欄等空間已存在的情況下，還要發行漢文雜誌？他提示讀者，《南國文藝》的創刊，應從為什麼「還是不得不發行雜誌」，加以思考。他認為，純文學綜合雜誌《台灣文學》、《文藝台灣》以及短歌雜誌《台灣》，分別隸屬於以張文環、西川滿、齋藤勇等人為中心的日文發表群體；《台灣藝術》則是「稍偏向於民眾的慰安雜誌」、「娛樂雜誌」。相較於這些雜誌，《南國文藝》不以娛樂或慰安為走向，也不侷限某種文類、某種群體，「沒有甚麼中心人物，沒有偏於一方面的在工作著」，「或是努力於日本文學的介紹，或是盡力於未整理途上的本島事情的諸種調查研究」，與《民俗台灣》具有「共通的使命」，但是由於《民俗台灣》並非文藝刊物，所以《南國文藝》與它又有所區隔。

此外，該文還以近乎難解、極不流暢的白話文，針對「漢文雜誌創刊的意義」進行如下辯護：

最近聽見林君荊南要創刊『南國文藝』。實在使我喜歡不過的事情。

我希望它能夠健全的發展，而略談我所感的一段以為祝辭。於這非常時局的現在，而且，正在認真實行皇民化運動的本島，純漢文文藝雜誌發行的創舉，到底有包含著甚

[49] 林荊南，〈血書〉，《南國文藝》創刊號，卷頭。底線為筆者所加。

麼意思？我想有一番考慮的必要。^[50]

針對漢文刊物創刊恐將遭致的質疑，無涯氏努力提出正面觀點。他提到，在戰時下創設漢文刊物，似有背離「國（日）語普及運動」之嫌，但是這正表示「國語普及運動」有其極限，台人日語能力也有侷限，所以為謀求台灣文化向上，創刊漢文雜誌乃是不得已的辦法。他甚至挪用當時的國策性修辭，表示：戰時體制下還能發展文化工作，足以表現「大東亞的盟主的我們大日本帝國」國力充裕；而且為文化發展較日本內地遲緩的台灣盡力，也算是善盡「守護後方的一種義務」；台灣與中國僅一衣帶水之隔，為善用地理便利達成大東亞共榮圈建設的使命，文化工作須以作戰精神來奮鬥努力。最後，他更祭出充斥於戰時宣傳中的「指導性」一語，指出在共榮圈建設的背景下，「我們台灣是站在指導的地位」，《南方》雜誌存在的理由，在於「明白被指導（者）的狀態」；^[51]而《南國文藝》則是進一步對於「指導者」進行了解，此一必要性也就是《南國文藝》「存在的理由」。稻田以學者思維冀望林荊南以「求學的態度」貫徹初衷，同時暗示性的警告若有人對這樣的立場進行惡意的批評，則無異於「非指導」言論。^[52]

〈祝南國文藝發行〉比起〈血書〉更為慷慨陳辭，極力聲援漢文文藝雜誌創刊的這位匿名作者「無涯」是誰呢？他其實並非台籍人士，而是前述《台灣歌謠集》的作者稻田尹。而稻田之所以熱情跨刀強力背書，正基於前述《風月報》上的一段合作情誼。林荊南利用他與稻田合力在《風月報》上累積的民間文學、民俗整理成果，提出「台灣未整理的文獻（考古學上的文學）」作為對外公開的發刊宗旨，比起違反日語運動的「維繫漢文」主張，此時顯得更為適切而有說服力。

綜上所述，林荊南認為透過民間采錄，以漢語形式徵集、整理、出版民間文學遺產，是迫切的文化工作。1941年與稻田尹的

[50] 無涯，〈祝南國文藝發行〉，《南國文藝》創刊號，頁1。

[51] 他所謂的被指導者，係指大東亞共榮圈中新占領的華南、南洋各民族。

[52] 他寫道，「林君荊南竭盡全力達成如上的使命，同時不可被一部人士的非良心的言動紊亂了健實的心靈，徹底視那些為不是指導的，須要以求學的態度來貫徹初志。」

合作經驗，強化了他擴大努力的信心。帝大年輕學人稻田尹，若非值遇兼具和／漢／台語多重語文學養、致力於民間文學整理工作的稻江文化先進林怒濤，以及同樣兼具和漢文書寫能力及流利台語能力的青年作家林荊南，可能無法為後世留下珍貴的《台灣歌謠集》。相反地，《風月報》社群如非受稻田鼓吹，成立「土俗學研究係」及「台灣民俗研究會」，可能也難以從漢文欄廢止政策中突圍，找到創設漢文誌的靈感與資源吧？

（二）台灣還有創刊漢文雜誌的必要：台北帝大教授的加持

接下來，我們要進一步思考《南國文藝》「台灣未整理的文獻（考古學上的文學）」所指為何？依「土俗學研究係」及「台灣民俗研究會」活動觀之，應指民間文學或民俗文章。然而，《南國文藝》創刊號中，林荊南、林怒濤、稻田尹等人熱衷搜集整理的文章卻付之闕如，依實際內容觀察反而似指台灣史記遺事、明鄭清代台灣古典詩等台史文獻或士人詩歌。兩者之間，一為民間文化，一為士人著述，差異不小。故而，本段將繼續發掘戰時下台灣漢文知識份子與台北帝大日籍學術人士，共同合作從事台灣文化整理工作的背景與氛圍；藉此勾勒《南國文藝》如何廣泛定義「文獻」，藉此從殖民地知識界中爭取核許發刊的有利資源，創造漢文誌重出的條件？

任職於台北帝大的稻田尹，其實亦是該校畢業生。他與多田道子、宮本延人，是《南國文藝》上僅有的三位日籍作者。宮本〈台灣的原住民族（一）〉一文，探討以考古學與民族誌進行台灣原住民研究的相關問題。文藝雜誌以連載方式刊出人類學研究論文，在當時是頭一遭。此外，在一份民間文化人士創辦的漢文雜誌上，又何以同時出現兩位台北帝大學者？這些都牽涉了當時活絡一時的帝大台灣研究風氣。

台北帝國大學，成立於1928年。1929年文政學部東洋文學講座開設，曾任日本大谷大學教授及宮內省圖書寮囑託的神田喜一郎（1897-1984），因家學淵源深厚，漢文素養不遜台灣學者等考量，被文政學部長藤田豐八聘為助教授，後昇任教授，擔當東洋文學講座。此後，除了1934到1936年間前往英、法留學之外，在台執教到日本戰敗為止，台北帝大為其一生任職最久之場所，

晚年仍多所懷念。^[53]稻田尹，為神田指導學生。根據張寶三有關帝大時期神田喜一郎教授的相關研究表示，當年東洋文學入學人數極少，自1933到1943年間，僅有台籍生田大熊、吳守禮、黃得時及日籍生稻田尹、藤原登喜夫等五名學生畢業。田大熊（台中人），1929年入學，台北帝大第二屆學生，1933年畢業。吳守禮（台南人），1930年入學，與田氏同年畢業，為台北帝大第三屆學生。黃得時（台北人），1934年入學，1937年畢業。^[54]依據《台北帝國大學一覽》記載，當時修業年限從三年起到六年止，稻田於1936年4月至1939年3月就讀台北帝大文學科；^[55]此時田氏、吳氏皆已畢業，吳守禮留校擔任神田副手，田氏任職於台灣總督府圖書館，^[56]黃得時則為比稻田高二屆畢業之學長。1936年12月24日帝大東洋文學會於台北鐵路飯店主辦「郁達夫訪台歡迎會」，在神田與西洋文學教授矢野峰人（1893-1988）、^[57]島田謹

[53] 神田喜一郎自幼受任職京都帝室博物館學藝委員、與羅振玉、王國維、董康等人有交往的祖父神田香巖影響，對中國文學、歷史極具興趣，亦能創作漢詩，1921年畢業於京都帝大史學科，受業於內藤湖南、狩野直喜等名師，1923年任大谷大學教授，1929年來台北帝大任教。戰後任大谷大學、大阪商科學、大阪市立大學等校教授，1952年任京都國立博物館館長，其專門之中國研究被稱為「神田學」，主要著作有《東洋學說林》、《敦煌學五十年》、《典籍笥記》、《日本書紀古訓考証》、《日本における中國文學》等，另主編有《內藤湖南全集》，1972年獲選為日本學士院會員。晚年，他在〈台北帝國大學〉一文中，對台北任教歲月多所懷念，該文收錄於《神田喜一郎全集》10卷，（京都：株式會社同朋舍，1990年6月），頁369。參見，張寶三〈任教台北帝國大學時期的神田喜一郎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日本漢學研究初探》，頁323-324。以及，吳文星撰，許雪姬總策劃《台灣歷史辭典》，頁667。

[54] 參見張寶三，〈任教台北帝國大學時期的神田喜一郎之研究〉，頁333-334、345-347。以及，《台北帝國大學一覽》，1937年份〈學生生徒〉名單、1943年份〈大學卒業生（文政學部）〉名單。

[55] 參見《台北帝國大學一覽》，1937年份〈學生生徒〉及1943年份〈大學卒業生（文政學部）〉名單。

[56] 依據張寶三研究，田大熊畢業後首先任職台灣總督府圖書館，後轉任南投中學校長、員林中學、草屯中學教師等。

[57] 矢野峰人（矢野禾積），日本岡山縣人。京都帝大畢業，1921年擔任大谷大學教授，1926年擔任台灣總督府高等學校教授，期間受總督府派赴英國牛津大學留學，1928年台北帝國大學創立時，回台擔任文政學部教授，教授西洋文學講座。1937年出任文政學部學部長。1939年兼台北帝大評議員、普通試驗委員長、圖書館館長、台灣文藝家協會會長、皇民奉公會文化部參事，為文政學部極具影響力之教授，亦受總督府相當禮遇。此外，矢野為知名詩人，與西川滿主導的《文藝台灣》集團親近，主要創作發表於《文藝台灣》、《台灣文藝》（台灣文學奉公會）。參見，《台北帝國大學一覽》，1928-1943年份。（現存台大總圖書館收藏之一覽只到1943年止，因此之後任教記錄不明；不過當時多數帝大教授都持續任教到日本戰敗投降為止。）另參見，鍾淑敏撰，許雪姬總策劃《台灣歷史辭典》，頁271。

二（1901-1993）^[58]帶領下，田大熊、吳守禮與尚未畢業的稻田尹、黃得時，也出席了這場歡迎會。^[59]

田大熊任職台灣總督府圖書館期間，曾與同事陳鐵厚合編陳維英先生（1811-1869）^[60]《太古巢聯集》，神田特別贈序稱許他們對本島文獻的重視：

自予承乏台北帝國大學。主東洋文學講席。本島子弟從予而游者數人。其稱首為田君大熊。深思好學。尤留意本島文獻。畢業後奉職台灣總督府圖書館。其僚友有陳君鐵厚。亦以風雅相尚。竝為俊逸之才矣。頃者二君蒐輯陳迂谷所撰楹聯。得數百對。乃編為一卷。名曰太古巢聯集。太古巢者。蓋迂谷晚年讀書之處也。予嘗讀迂谷詩。託興遙深。庀材宏富。而宮商繁會。尤有琴笙逸響。非浸淫於三李二杜者不能。意在東寧詩人中。當首屈一指矣。今獲其聯集而讀之。名言雋語。絡繹不盡。至其對仗之工。愈出愈奇。猶遊銀台金闕。珠玉雜陳。使人目眩。不能正視。益歎迂谷天才亮特。超然有出塵之概。宜乎田陳二君謀其流傳也。顧迂谷詩未見刊本。若與楹聯併而刻之。嘉惠藝林。其功更鉅。不知田陳二君倘有意乎。實予跂而望之。^[61]

神田序後，接著為北台詩壇中堅林述三所作的〈序〉，最末則為編者序。編序中，兩位年輕編者敘述5年辛苦的輯錄與重刊過程，並謙遜地表示：「才疏學淺。心願學先人步趨。凡獲有名章佳句。什襲藏之。永存軌範。仄聞家先生維英。字碩芝。號迂谷。前清時。為台灣師長。名動朝野。讀書于太古巢。其文

[58] 島田謹二，日本東京市人。東京帝國大學畢業後，於1929年起擔任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講師到1944年止，教授英語、法語、文學概論。

[59] 戴國輝（作）、陳鵬仁（譯）〈郁達夫與台灣〉，《近代中國》152期，2002.12，頁223-234。

[60] 陳維英，字實之，又字碩芝，號迂谷，台北大龍峒人。1851年選孝廉方正；1859年舉鄉試，授閩縣教諭。後掌教仰山、學海兩書院。1862年戴潮春之役，與紳士合辦團練，以功賞戴花翎。晚年築室於劍潭之畔曰：「太古巢」，製聯榜之，騷壇爭傳。擅長詩文、聯語。著有《偷閑集》、《太古巢聯集》、《鄉黨質疑》等。參見，徐慧玉撰，許雪姬總策劃《台灣歷史辭典》，頁855。

[61] 神田喜一郎〈序〉，收錄於田大熊、陳鐵厚編《陳維英先生太古巢聯集》（台北：無聊齋發行，三和印刷所，1937.10）。台灣大學總圖書館館藏。

其詩。則已久傳當世。而聯文則散布四處。讚美稱誦。有其人未見全集。晚因近欲學。頗欠指南。乃因久知先哲碑口。遂歷諸艱辛。遠求其珍構。閱五星霜。得三百八十餘聯。凡山間水涯。人家廟宇。靡不神馳。履跡逐尋焉。故能如願。」^[62]被索序的林述三，可能也是兩人尋訪楹聯及藏稿過程中，賜予協助者。林述三（1887-1957），筆名怪星、唐山客、蓬瀛一逸等。曾領導台北重要詩社「星社」^[63]，1921年於稻江創立「天籟吟社」，擔任社長；1924-25年間擔任《藻香文藝》主編，後曾任《風月》副主筆兼會計部長、《南方詩集》編輯顧問。林氏在《風月》中發表掌故與舊詩，擅長謎學，其子林錫牙亦為林荊南好友。

神田弟子畢業論文題目以古典文學居多^[64]，但是受到神田重視台灣文獻的影響，諸生皆抱持對台灣文學及文獻的關心，並且實際投入創作、調查或研究行列。前述1943年稻田尹《台灣歌謠集》出版時，神田亦親自為弟子作序。序中略述他曾於1922年秋季訪問北京，見識到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進行的全國歌謠徵集工作，後來又輾轉蒐集到幾期北大刊行的《歌謠週刊》，得到不少啟示。透由北大歌謠整理工作的借鑑，他期許稻田尹的工作能夠「進一步向與台灣僅一衣帶水之隔的福建、廣東推展，為研究現代中國歌謠作出一大貢獻。」^[65]《台灣歌謠集》雖以採錄與日譯為主，卻象徵了1930年代受中國歌謠運動影響，從民間起

[62] 參見編者〈序〉，收錄於田大熊、陳鐵厚編《陳維英先生太古巢聯集》。

[63] 星社是日治時期台灣頗為重要的詩社。社員人數不多，但是各有擅長，活躍一時。該社前身為成立於1915年的「研社」，1921年陽曆元旦正式舉行首屆雅集，1924年並出刊《台灣詩報》以推廣詩學。星社初期亦多從事擊鉢吟，但過程頗暫，數年後便以閒詠自由發揮為主，課題交卷為副，且多好作古體，在當時台灣詩界側重擊鉢的情形下，可謂獨闢新徑。黃美娥撰，許雪姬總策劃《台灣歷史辭典》，頁579。

[64] 神田在台北帝大擔任「東洋文學普通講義」、「東洋文學講讀」、「東洋文學演習」、「東洋文學講讀及演習」等科目，授課內容包括東洋文學史、元雜劇、清人詩話、漢詩概說、文心雕龍、毛詩注疏、元曲、中國戲曲、尚書正義等。在學生卒業論文方面，田大熊論文題目為〈唐宋以前ノ評論界〉、吳守禮為〈詩經の文法的研究〉、黃得時為〈詞の研究〉、稻田尹為〈紅樓夢研究〉、藤原登喜夫為〈聊齋誌異之研究〉。參見，張寶三〈任教台北帝國大學時期的神田喜一郎之研究〉，頁328-334，以及林欣怡、陳偉智〈簡介台灣大學所藏「台大校史檔案」〉，《Academia——台北帝國大學研究》2號，台灣大學台灣研究社，1997.05，頁101-106。

[65] 參見稻田尹，《台灣歌謠集》（台北：台灣藝術社，1943年4月），台灣大學圖書館所藏；相關討論亦可參見，胡紅波，〈稻田尹的《台灣歌謠集》〉，《台灣文學評論》1卷2號，2001.10，頁212-216。

步的台灣民間文學整理研究^[66]，經過十餘年終於進展到學院化階段，因此別具意義。

吳守禮（1909-2005），有台語之父美譽，受到神田啟發以及東洋史專攻學長柯設偕的影響，在帝大求學及任教時期開始對台語文獻及台灣白話字產生興趣。1938年吳守禮受神田推薦，赴日本京都東方文化所任囑託，1943年返台任職台北帝大南方研究所。吳氏將其獻身台語文獻整理研究的出發點歸功神田，直到晚年對恩師仍極敬重。他提到，1933年以台北帝大教授為中心的台灣文獻愛好人士，注意到台灣民間散逸著大量重要文獻，因而組成「愛書會」，發行雜誌《愛書》，神田為參與者之一。^[67]1936年神田讀到由日本輸入帝大圖書館的《北平圖書館刊》10卷5號之〈記牛津所藏漢文書——瀛涯瑣志之一〉一文，便據以撰寫〈關於牛津所存的台灣古文獻〉（〈牛津に存在する台灣の古文獻について〉），投稿1938年4月號《愛書》雜誌。某台籍讀者讀及此文後將私藏的《順治刊荔枝記》（詳名《新刊時興泉潮雅調陳伯卿荔枝記大全》），寄贈神田，神田又將之複印給吳守禮。因此對於原本耽讀經學、甲骨、金文的他，產生很大的啟發。^[68]後來吳氏以此因緣開始注重台語研究，更於戰後陸續發表以荔枝記為中心的閩南古語研究，開啟戰後台語研究的先河。^[69]

[66] 1931年元旦，黃周（醒民）於《台灣新民報》上發表〈整理「歌謠」的一個提議〉，乃是台灣民間文化人介紹1920年代北大中國歌謠整理運動最為代表性的文章。有關中國歌謠整理運動影響台灣及其傳播過程中衍生的變異問題，可參見周志煌，〈共同體的想像：1930年代前後台灣與中國歌謠采錄活動之繫聯與同異〉，彰化師範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主辦，「與傳統對話：民間文化的當代觀照」學術研討會，2007年8月3日。

[67] 「台灣愛書會」發起人中與台灣文學界有關之教授有矢野峰人、神田喜一郎、島田謹二、瀧田貞治，與報界有關者有大澤貞吉，與圖書館界有關者有山中樵。參見，〈台灣愛書會成立小誌〉，《愛書》1輯（台北：台灣愛書會，1933年6月），頁208。

[68] 吳守禮對業師神田的敬重，由其1977年刊行《什音全書中閩南語資料研究》時，特別注明「賀神田喜一郎博士八秩誕辰而出版」，可見一斑。他於回憶文中提到「我有幸承暢庵師賜與《順治刊荔枝記》全錄拷貝，據以校理原文紬繹閩南古語」；參見，吳守禮《清順治刊荔枝記戲文校理》〈序〉，（《從宜工作室》，2001.12）。該冊孤本隨同神田藏書一併捐贈，今日仍保存於京都大谷大學。

[69] 包含〈福建語研究導論—語言與民族〉（1949）、《校註海音詩全卷》（1953）、《台灣省通志稿人民志卷二語言篇》（1954）、《近五十年來台語研究之總成績》（1955），以及《順治本荔枝記校研》（1966）、《順治本荔枝記研究—校堪篇，附方言詞彙》（1968）等。

柯設偕（1900-1990）^[70]，畢業於1931年，與黃得時、稻田尹等人的畢業論文皆由神田指導，論文為〈台灣名稱的歷史性及地理性考察暨古代漢民族關於台灣智識的變遷〉，可謂第一部台灣史研究學位論文。^[71]黃得時（1909-1999），於帝大生時期開始參與台灣新文學團體^[72]，為戰爭期活躍之副刊編輯及文評家，同時關注布袋戲、台灣古蹟、民俗等問題；他對當時本土文藝發展及往後文學史書寫影響深遠之論說〈台灣文壇建設論〉（1941.9）、〈輓近の台灣文學運動史〉（1942.10）、〈台灣文學史序說〉（1943.7）、〈台灣文學史（二）〉（1943.12），皆建立於對明清、日據台灣文學文獻整理耙梳之基礎上。台灣光復後吳守禮留任台灣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後昇任教授，以迄退休，黃得時亦同。柯、黃兩位，依其跨時代之特殊學養及對本土文化的關懷，對於戰後台語研究及台灣文學研究的薪傳及開展，皆具有先驅性影響。

柯設偕、田大熊、吳守禮、黃得時、稻田尹等人，對於台灣文學、語言、歌謠及文獻的關注，雖受到神田喜一郎教授啟發，亦不可忽略當時台北帝大文政學部南方研究及台灣研究整體風氣的影響。台北帝大設立後被規劃為日本帝國的「南方研究」學術基地，以華南、南洋為研究重點，台灣研究隸屬其中。就人文研究領域所屬的文政學部（含文學科、史學科、哲學科、政學科）而言，史學科的南洋史學講座與土俗人種學講座為重點研究。前者由村上直次郎教授、岩生成一教授擔任，強調西班牙文、荷蘭文訓練，以及南洋歷史及西、荷史料分析；後者由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出身的移川子之藏及慶應大學畢業的宮本延人等擔任，史學科第一屆畢業生馬淵東一即為此講座訓練出來的優秀學生，畢業後留校擔任副手；東北帝國大學畢業的台灣人陳紹馨，也於1943年受聘擔任土俗人種標本整理工作。在禁止使用「台

[70] 柯設偕，為宣教師馬偕（Rev. George Leslie Mackay, 1844-1901）之外孫。

[71] 日文原題為〈台灣の名稱の歴史的並に地理的考察及び古代漢民族の台灣に關する智識の變遷〉，參見《日本漢學研究初探》，頁334。

[72] 1934年參與台灣文藝協會成立被推為幹事；1935年擔任台灣文藝聯盟北部地區委員；1940年加入日人作家西川滿等發起之「台灣文藝家協會」，為機關誌《文藝台灣》編委之一；1941年與張文環、王井泉另組「啟文社」，創刊《台灣文學》，並於三〇年代後期到四〇年代前期擔任《台灣新民報》、《興南新聞》學藝欄編輯，1944至45年擔任《台灣新報》編輯。

灣民族」、「台灣研究」一詞的當時，土俗人種學講座下以「南方土俗學會」為名設置研究會，定期舉行例會，並發行《南方土俗》雜誌，聚集當時人類學者於一堂，為台灣制度化人類學研究之開始。史學科除了正式課程與學會活動之外，1936年6月起還設置了「台灣史料調查會」，推動台灣關係史料的蒐集整理與島內史蹟調查。^[73]

政學科是文政學部中師生人數眾多、學術活動鼎盛的活躍科系。該科歷屆台籍生高達四十餘人，為文政學部之最。^[74]政學科有6個學會，其中「金曜會」不限政學科成員，因此其他帝大師生乃至台灣文化人士亦曾參與；譬如向來支持台籍作家的英文學者工藤好美教授，即受邀前往演講。^[75]此外，即使在師生人數極少的哲學科中，也有飯沼龍遠教授等人主持的「高砂族記憶」研究，以及岡田謙教授有關首狩原理、布農族家庭生活、士林祭祀圈之研究，這些成果對戰後台灣史學、人類學、社會學研究皆有重要影響^[76]，而此亦與「南方土俗人種研究室」帶動的學術風氣有關。在文學科方面，則以神田教授領導下的東洋文學講座學生吳守禮、黃得時、稻田尹等人對於閩南語、台灣歌謠、漢文傳統文學、布袋戲、歌仔冊的整理及研究，最具代表性。總之，日據後期，以日籍教授、研究室、讀書會、調查會、講習會為中心，文政學部成為關懷台灣研究之帝大教授、年輕學生及台灣文化人士匯聚的中心。

如上所述，稻田尹在1930年代中期到1940年代文政學部台灣研究風氣高漲的背景下受教並就職，長期受到重視台灣文獻的神田教授以及幾位關注台灣語言、民間文學、台灣新文學的台籍學長影響，培養出對台灣歌謠、歌仔冊的高度關心與研究興趣。1938年畢業留校服務後，開始全力投入台灣歌謠與歌仔冊的調查、整理與研究工作。研究者王順隆指出，「歌仔」一詞直到

[73] 參見陳偉智〈文政學部—史學科簡介〉，《Academia——台北帝國大學研究》創刊號，台灣大學台灣研究社，1997.05，頁72-98。

[74] 1937-1940年就讀台北帝大的辜振甫即為該科學生。

[75] 參見陳昭如、傅家興〈文政學部—政學科簡介〉，《Academia——台北帝國大學研究》創刊號，頁19、22。

[76] 相關研究刊載於台北帝大，《哲學科研究年報》；參見，邱景墩〈文政學部—哲學科簡介〉，《Academia——台北帝國大學研究》創刊號，頁103-105。

1941年才被稻田尹提升為「專有名詞」，專指七字一句或五字一句的長歌；而堪稱當時台灣歌仔冊研究第一人的稻田尹，其研究還曾間接刺激了本土台灣歌仔冊的大量發行。^[77]

除了在學院內進行研討與研究之外，帝大青年學者也實際走入台灣社會。林述三為田大熊、陳鐵厚作序、協助楹聯及藏稿尋訪調查的案例，以及林怒濤協助稻田尹進行台灣歌謠調查，並為其著作寫序的情形，都具有這種共通性。不論台籍或日籍，當青年學者對台灣文化、民間文獻抱持關心，意圖展開調查或研究時，走出學院離開其日籍業師身畔，流連於北台文學耆宿或文化人門下，向這些熟諳台灣文史掌故及語言文獻的文士，進行請益與求援，便成了必要之途，因此也開啟了殖民地學術界與台灣民間文士之互動。

1941年7月，《風月報》五週年紀念之際，為表面響應文學統制潮流與文化動員要求，改題為《南方》。改題披露會上的與會貴賓，除了台灣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委員、台北憲兵隊、北警察署、興南新聞社、台灣日日新報社、台灣藝術社人士之外，以台北帝大學者最為醒目；資深的神田教授以及年輕的史學科土俗學研究室宮本延人講師、東洋文學研究室助手稻田尹，連袂出席此一發表會。此外，神田弟子黃得時以興南新聞學藝部人員出席，歌謠家林怒濤也側身其間，並且受到格外的尊崇。刊載於《南方》的〈本社改題披露會的概況〉，記載了當日會場情形，文末特別摘錄神田教授祝辭並以放大黑體突顯其重要性，藉此代表來自殖民地最高學府威權人士的支持：

神田博士站起來演了一場最痛快的祝辭說：「風月報改題做南方的意義，我雖然不甚知道，大概是台灣位鎮（按，「鎮」應為贅字）於帝國的南方，所以便取題做南方吧？不過，南方却不是單指台灣的，華南、南洋一帶都是屬在南方的圈裡，這麼說了，南方的意義就不得於等閒而論了，而且現在高唱着東亞共榮圈、東亞新秩序的建設、日華親善、日華提携、不但日華要提携，日華滿及東亞諸民

[77] 參見王順隆，〈台灣歌仔戲的形成年代及創始者的問題〉，《台灣風物》47卷1期，1997年3月，頁39-54。〈談「台閩」歌仔冊的出版狀況〉，《台灣風物》43卷3期，1993.09，頁109-131。

族都要親善纔是。（中略）從前有一方面說漢文沒有甚麼必要，然而現在的時勢不同了，於東亞新秩序建設之下，對於從前的觀念須要更新認識纔好！……」^[78]

除了鋪陳一段老生常談的國策話語，強調「南方」此一概念在促進東亞民族親善及大東亞共榮圈建設方面，非比尋常的意義與政治正確性之外，神田主要目的不外利用公開場合肯定、強調、推薦——「漢文」雜誌存在的必要性。在厲行日語運動的島內，漢文的存在與皇民化運動有所牴觸，但是就東亞新秩序的建設而言，漢文仍是東亞諸民族親善的必要媒介；因此，這也就成了神田為漢文雜誌辯護的重要立足點。

事實上，《風月報》之所以改名，並非妥協於軍國意識形態，而是受到特務憲兵的壓力。1978年，林荊南在其暮年自傳性長篇小說〈窮與罪〉中，曾道出這一段不為人知的原委。他提到由於「日本軍方特務上田憲兵，罵《風月報》是『吟風弄月』，太無聊！不合時代的要求！」，發行人簡荷生不以為然，曾說「上田仔懂得什麼？我們吟我們的風弄我們的月；他侵略中國，進犯美國，鯨吞南洋，夢想『八紘一字』」……」，但是丁滌英^[79]則主張為避免遭到停刊宜改名，並提議相對於日本之「南進」，「我們踞守『南方之強兮』，延續我們的傳統文化」，因此《風月報》便更名為《南方》。^[80]依據改題發表會記錄，台北憲兵隊入田先生^[81]，亦為當日出席者之一。

在〈本社改題披露會的概況〉中擔任記錄、署名「哲也」的作者，其實也就是林荊南。林荊南在改名提議、改名發表會發言安排及發表會記錄發佈等過程中，皆積極扮演著促使《風月報》穩健存續的推手，而其思考模式與對應策略即借重帝大學術勢力作後援。在漢文欄廢止多時的1941年，若欲強調漢文雜誌存在的合理價值，除了執掌殖民地最高漢文教學研究機構的台北帝大東

[78] 哲也〈本社改題披露會的概況〉，《南方》134期，1941，頁11。

[79] 小說主人公，即林荊南自身寫照。小說〈窮與罪〉的人物，有以真實姓名登場，亦有以化名出現。譬如本段描寫中的簡荷生，即以真實姓名登場。

[80] 林荊南著、施懿琳編，《林荊南作品選集》，頁255。

[81] 〈本社改題披露會的概況〉中，有「台北憲兵隊福吉，入田兩先生」之出席記錄，因此上田可能為入田之誤。

洋文學講座教授，又有誰更具發言的正當性與影響力呢？

在爭取學術領域意見領袖支持的同時，《南國文藝》也同時演繹了近衛內閣「新體制」運動中對於地方文化的重視。1940年7月第二次近衛內閣成立後展開新體制運動，10月「大政翼贊會」成立，文學者也被編入組織中。由於新體制運動強調「高度國防國家」理念，重視文化的政治效用，台灣殖民統治當局在翼贊會文化部提倡的「地方文化」與「外地文化」等政策影響下，也開始對原本採取壓抑主義的文化政策進行了調整。1941年5月《台灣文學》、7月《民俗台灣》的創刊，都掌握了此一文化轉向的契機。除了本土文化與文藝界的復甦之外，台灣文化的知識建構也在殖民地大學機構中達到巔峰。在此背景下，不拘新／舊、雅／俗、民間文學／士人著作，將漢文文藝廣泛定義為大東亞共榮圈下的「地方文化」、「文化遺產」，以此觀點致力地方文化遺產（在地傳統）的整理保護以及傳承空間確保，便是許多台灣文化人的根本目的。這種「自我民間化」、「自我遺產化」的操作，是在斟酌民族主義漢文本質主義舊有的「維繫斯文」思維之後，為被禁錮的民族語言與文化生產，尋找存續空間的一種協商。

在大東亞共榮圈版圖即將再次擴大的1941年底，受殖民者的民族主義與民族文化也面臨了去本質主義的高峰。《南國文藝》諸人以「民間遺產知識化」作為維繫漢文文藝發展的新象徵符號，苦心孤詣可見一斑。這樣的策略，在皇民化運動與戰時文藝統制施行的敏感時期，並非絕無僅有。1941年中旬《台灣文學》雜誌創刊之際，台籍作家張文環等人為確保發刊順利，除了援引大政翼贊會「地方文化」理念，也積極爭取開明派帝大教授工藤好美^[82]及中村哲^[83]等人的參與和支持。即使是在台日人發行的《民俗台灣》，也因為在皇民化運動下推動台灣民俗整理研究恐

[82] 工藤好美（1899-?），日本大分縣人，早稻田大學英文系畢業，曾任富山高等學校教授，1928年台北帝大創立時擔任文政學部助教授，教授西洋文學、英文學，直到日本統治結束。參見，《台北帝國大學一覽》，1928年份。在台期間與台籍作家張文環、呂赫若、龍瑛宗、吳濁流、王白淵等台灣作家，交往密切。

[83] 中村哲，日本東京市人，1937年任文政學部政學科助教授，擔當憲法講座，1942年昇任教授。參見，《台北帝國大學一覽》，1937年、1942年份。

遭批評，而需要金關丈夫等學人的護航。^[84]此外，以日本外地文學為關懷中心的《文藝台灣》，其創辦者西川滿與學界人士如島田謹二、矢野峰人等人，也關係匪淺。前述神田教授及其周遭學人，支持漢文文獻保存、民間文學採錄、台語研究及漢文現代文藝雜誌創刊的作為，使戰時下奄奄一息的台灣語言及文化獲得扶持。但是，這並不表示彼此抱持同樣的文化理想或文藝志向。

根據橋本恭子的研究：「晉身為台北帝大的知識份子，各擁有自己專業領域的學問，是極為優秀的。但以肯定殖民統治作為前提的他們，從權力機關——總督府角度來看，只不過是「國策大學」機能運作下的一根「有用的螺絲釘」他們所發表的研究與言論，從來沒有動搖過殖民統治的基礎，大都是屬於協助推動國策的言論，只是有積極協力或消極迎合之別。」^[85]戰時體制下帝大教授對台灣文化人與文化運動的觀點因人而異，以順應國策為主，卻有態度之別。被歸類為消極派的工藤好美，根據當時與他親近的台灣作家回憶，堪稱台灣文化人之友。^[86]有意無意扮演了台灣漢文文藝界「護身符」的神田喜一郎，也博得其弟子的尊敬及當時文化人的親近。但是1943年神田赴日本占領區香港擔任「市民圖書館」（原香港大學圖書館）館長時，在該館擔任要職的香港知名文化人陳君葆對他的印象，卻流露了與台灣文化人極為不同的警戒與疏離感。此一差異除了顯示殖民地台灣與占領區香港對應日本文化人時，因為文化人身分、統治型態與占領歷史的差異，所形成的不同文化心理與互動模式之外；另一方面也突顯了神田等殖民地大學教授作為帝國文化統治機器一環，其角

[84] 參見王昭文，〈日據末期台灣的知識社群——《文藝台灣》、《台灣文學》、《民俗台灣》三雜誌的歷史研究〉，清華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1991年。

[85] 引自橋本恭子〈島田謹二《華麗島文學志》研究——以「外地文學」論為中心〉，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3.01，頁37。

[86] 茲略舉三例說明：1943年西川滿、濱田隼雄發動「冀實現主義論戰」，攻擊呂赫若及張文環時，呂曾向工藤請益而找出處理之道，參見呂赫若著、鍾美芳譯、陳萬益編《呂赫若日記》（台北：印刻文化，2004年12月），頁352。1975年張文環以文學遺囑心情寫出《地に這うもの》時，也透過工藤在日本尋找出版管道，才使晚年復出之作順利問世。參見，林龍標〈我與文環兄〉，《張文環先生追思錄》（台中：家屬自版，高長印書局印刷，1978年7月），頁28-29。吳濁流晚年也曾懷念戰爭末期每月15日月明之日，工藤在其自宅與中村哲、畫家立石鐵臣、王白淵、龍瑛宗、呂赫若、張文環、張泉和、劉清烈、王耀勳等日台文友，談論文藝的往事。參見，吳濁流，《台灣連翹》（台北：草根，1995.07），頁145。

色隨著戰時體制日益極端化的本質。^[87]因此，《南國文藝》對帝大東洋文學教授的依靠，並非無異議的同化或傾斜，而是文化分層構造中本土文化人對於主流學術資源策略性的攀附、結盟或挪用。

台北帝大學界與台灣文化人士在戰時下展開的多面合作關係，無論雙方各自的出發點為何，也暫不論雙邊不均衡的權力關係如何引發續後複雜的宰制或滲透現象；至少在已知的日語文學界或民俗研究界之外，漢文文藝領域也受到東洋文學講座教授們的奧援，出現了具體的效益。不論是1941年7月《南方》雜誌的改題，或者1941年12月《南國文藝》的創刊，漢文文藝雜誌皆以日籍學術人士的聲援，應付漢文箝制與出版檢閱交織的惡劣現實。學界人士的公開肯定、指導或合作，成為戰時台灣文化活動推展的有力屏障和必要保證。神田喜一郎、稻田尹及宮本延人，對《風月報》、《南方》、《南國文藝》的合理性提供了某種程度的背書；而居中建立這層關係的重要人士，則是林荊南。以林荊南與稻田尹的交往為中心，逐漸形成一個小規模的台／日文化人支持網絡。學術機構由此得到民間文化人提供的在地文獻與傳統知識輔助，民間文化人則在學者的合法性背書下，得到維持民族文化最後一口自主氣息的回饋。

綜上所述，雜處於《風月報》、《南方》內部，不同世代、地域、學養、文學觀構成的文學者群落，往往在通俗文學路線之外另有追求，甚至不乏企圖試探新漢文刊物發行機會，或者意圖上溯事變前新文學漢文寫作的社會關懷與現實主義精神者。《南國文藝》，便是其中的一種具體的嘗試。儘管迅速夭折了，但是這個新刊的創辦策略，卻透露了文化人在軍國意識形態籠罩下不欲隨之起舞的突圍嘗試。從《風月報》在民俗整理以及通俗寫作方面所涵育的編撰人脈與文藝資源，可以看見台灣漢文作家如何在「新體制」之文化轉向契機中，挪用共榮圈脈絡下的地方文

[87] 島田謹二也隨神田赴任，擔當類似副館長之職。言行內斂、善觀察的陳君葆對島田的評價極為惡劣，幾可總結為「狼子野心」一語。對於神田的印象稍好，但也不乏批評。譬如，他曾寫道「神田不住地在各書裡翻出他的名字來，似乎很怕我不認識他在學術界的地位的神氣」，批評神田唯恐人之不己知，參見，陳君葆著、謝榮滾編《陳君葆日記》下冊（香港：商務書局，1999.04），頁62。

化、地方知識概念，與知識界中同情台灣漢文文藝運動的力量結合，催發了曇花一現的——戰時漢文文藝新陣地與新文藝精神的復現。

結論

「維繫斯文於一線」的呼聲，迴響在日本統治台灣的51年之間。然而，它不僅僅只是一種口號。與此相連結的概念與實踐，在不同時空下，層出不窮表現出不同的性質、強弱與形貌，因此「維繫斯文」可謂台灣殖民地文化鬥爭中最重要的意識形態之一。《南國文藝》儘管是一份不折不扣的短命刊物，由於不僵硬揭舉此口號，反而更加寬廣的展演了此一意識的可能性。在皇民化運動主導語言、文化與知識結構的當時，作為一個企圖和日語本位主義進行抵抗，扭轉不均衡文化流向的批判性知識社群，以民間文學整理作為鏈接的契機，以學院資源取得合法關鍵，以文化菁英的互惠關係，採取遺產化、知識化的彈性策略，林荊南等人的努力具有值得深思的文化價值與啟示性。

《南國文藝》編輯後記，開頭如此寫著：

無論周圍的形勢如何，我們毅然掛起「南國文藝社」的招牌了。這個含有歷史性的一天，便是我們開始文化工作的記念日。最可記憶的這天是台灣三百六十年來祇一次的日蝕之日。^[88]

該誌之所以遭禁，吳慶堂推測「日蝕之日」諷寓抗日的不當言論，還有無政府主義作家巴金作品的刊載^[89]，是主要原因；林荊南則認為與他出版《鄭成功》一書時，書末附錄鼓吹民族氣節的漢詩，違反當時國策有關。他說：「文學這條路不好走，早就應驗了。我寫了日文版《鄭成功》一書出了問題，出版「南國文藝」一期就夭折了！日本憲兵特務上田氏糾問：『為什麼在後面附錄一大堆的漢詩？』。經過不久，簡荷生先生警告我：『上田仔要找你的麻煩，你應該離開台北，……』我知道這時日本憲

[88] 南（林荊南），〈編輯室日記〉，《南國文藝》創刊號，頁56。底線為筆者所加。

[89] 此係呂興忠1994年12月訪問吳慶堂夫人及其公子吳正風所得口述資料，參見呂興忠〈吳慶堂戰後初期的五首新詩遺稿初探〉，前揭文，頁231。

兵、刑警們都在製造莫須有的冤獄！我不再猶豫，就攜眷逃入台東的蕃墾牛湖。」^[90]直到1943年秋，林荊南才從台東返回彰化，前往無緣親覩最後一面的賴和靈前致詩五首，以〈追悼無名氏〉為題悼念賴和。事變前兩度因無政府主義傾向被捕入獄的吳慶堂，也因為編輯《南國文藝》，再次被日本特高追緝，最後被迫「自願接受徵召」加入海軍巡查，遠赴菲律賓戰場。^[91]從小患有氣喘痼疾的吳慶堂，從軍前特別攜帶賴和生前為他配制的藥包，後來卻因軍艦遇強風，船艙進水，藥材盡失。^[92]

如上所述，《南國文藝》實際的編撰路線及創作表現，顯示出與《風月報》極為不同的純文學批判精神，然而這卻無法成為雜誌發刊的宗旨。一份意圖突圍的雜誌，整合了各種文化界與知識界的有限條件，終於勉強發行；然而，創刊一期之後，一切苦心付諸東流，核心人物也因此亡命天涯，付出慘重代價。儘管如此，《南國文藝》在漢文欄廢止年代的破冰意義，其欲承傳的台灣新文學批判精神，以及所顯示的殖民地學術系統、民間文學工作者、漢文通俗文學雜誌社群、跨越事變作家交相援結，開創短暫陣地的經驗，卻是戰時文化界中彌足珍貴的一頁。在《南國文藝》已成海內外孤本、泛黃舊籍之今日，重新提起殖民史上最後帶有純文學理想的漢文雜誌之一頁故事，正足以策勵後世的我們以嚴肅態度觀待前賢薪傳台灣文化之艱辛。



[90] 引自林荊南，〈磺溪文學與我一代序〉，無標示頁數。

[91] 參見呂興忠，〈吳慶堂戰後初期的五首新詩遺稿初探〉，前揭文，頁231-232。

[92] 同上註，頁215。

Cultural Heritage and Knowledge Fight:

The First Issue of Han Language Modern Literary Magazine in War Period

Liu, Shu-Chin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In July of 1937, Taiwan Newspaper terminated Han language column, and Chinese literature magazines ceased publication in droves; however, on December 1st 1941, a week before the break out of East Asia War, Taipei City Rih-Sin-Ting unexpectedly published a Chinese Magazine, literature only — 《Nan Guo Literature and Art》. How could a pure Chinese literature magazine pass through the publication check on the eve of Pacific Ocean War, by the moment of prohibition against Han language in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and news paper deficiency? With the culture intellectual circles of the time, which were the conditions that benefited the reappearanc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rt? In the writer group and achievements of formerly published 《Feng Yueh Tabloid》, which one had become the assets of 《Nan Guo Literature and Art》? With the unusual publication phenomenon of 《Nan Guo Literature and Art》 as starting point, this paper thinks over how the procreation region of Han language culture used other society culture and knowledge resources as the gener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rt /shield of publication at its last gasp under colonialism? Under this shield, how the colonial academic research system, folk custom researchers, society group of Han language light literature magazine, and pure literature writers contacted each other to start a piece of hinterland for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rt under prohibition against Han language? The writer thinks that in 《Feng Yueh Tabloid》 and 《Nan Fang》, the north traveling writer

from Changhua, Lin Jing-Nan and "Doctor Dao-Jiang-Ge-Ren" Lin Nu-Tao devoted in song collecting and sorting work, further developing the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Feng Yueh Tabloid》 personage and the related professors of Doung Yang literature of Taipei Di-Guo University (predecessor of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And from that time, with the pure literary magazine concept and action of Lin Jing-Nan and another writer of Changhua City, Wu Ching-Tang before the war, new literary writers as the basic writer group of 《Feng Yueh Tabloid》 finally promoted the first issue of the last pure literature and art Chinese magazine of Taiwan 《Nan Guo Literature and Art》 during colony period.

Key word: *Nan Guo Literature and Art, Feng Yueh Tabloid, Nan Fang, Lin Jing-Nan, Wu Ching-Tang, Lin Ching-Yueh, Dao Tien-Yi, Taipei Di-Guo University (predecessor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a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art, cultural heritage, knowledge Fight*

